

全球对话

11.1

GLOBAL DIALOGUE

一年出版3期，以多种语言刊出

与 S.M. Rodriguez 谈社会学

Margaret Abraham

美国： 困境与机遇

Peter Evans
Gabor Scheiring
Christopher Muller
Suresh Naidu
Patricia Zavella
J. Mijin Cha
Marcus Anthony Hunter

华裔移民 在欧洲

Fanni Beck
Pál Nyíri
Ya-Han Chuang
Emilie Tran
Hélène Le Bail
Stig Thøgersen
Eszter Knyihár
Linda Szabó
Ting Deng
Jelena Gledić
Martina Bofulin

理论观点

Walden Bell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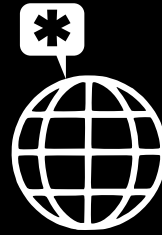
拉丁美洲的 社会学

Esteban Torres
José Maurício Domingues
Viviane Brachet-Márquez
Sérgio Costa
Aldo Mascareño
Verónica Gago
Carmen Ilizarbe
Mariana Heredia
Guilherme Leite Gonçalves

议题开讲

> 《全球对话》波兰团队介绍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第11卷 / 第1期 / 2021.04
<https://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GD



> 主编的话

在製作本期《全球对话》之时，全球媒体正在热烈关注美国大选，而我们也知道这导致了后川普时代，但这并不代表美国在过去几年所目睹的问题会消失。在「社会学对话」的专题中，Margaret Abraham采访了社会学家兼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维权运动者S.M. Rodriguez。深入探讨了美国对抗种族主义的历史，以及在社会不平等和社会正义的交织下，如何激發出这场社会运动。

随着选举的展开，Peter Evans和Michael Burawoy针对了美国的处境及可能性筹组了我们第一个专题。这些文章涵盖了美国「种族资本主义」的历史观点，并分析过去十年中经济和政治發展的影响，这包括社会福利减少、劳动阶级与有色人种之间具挑战性的关系、生态问题和气候变迁，以及在川普的政治引导下产生的惨重后果：在1月的华盛顿發生的那场令人震惊的事件。面对这种困境，作者也在文中探讨了要如何才能使改变成真。

我们的第二个专题由Fanni Beck和Pál Nyíri 着笔，文章关注了在欧洲地区的中国移民议题，概述了中国人移民欧洲的连续浪潮下的历史和现状。文章分析了这些移民的情形以及欧洲国家之间复杂的族裔关系，以及他们如何受到中国政治發展的影响，而COVID-19的大流行又是如何影响他们的处境以及他们对移民的论述。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目睹了极右翼运动、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政党及政权、经济危机、未解决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和移民所带来的新机遇。在理论的部分，Walden Bello将针对全球北方和南方极右翼人士的政治计划、做法和领导力进行比较。

在这次介绍区域社会学的部分，我们将关注于拉丁美洲的研究。Esteban Torres整理了一系列的文章，邀请我们在著名研究者对社会理论的学术發展与讨论中航行。其中大多数的研究者是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CLACSO, Latin American Council of Social Sciences)中社会理论和拉丁美洲现况(Social Theory and Latin American Reality)工作小组的活跃成员。

在「议题开讲」中，为《全球对话》翻译波兰语的团队将要介绍他们的成员，也藉此让读者瞭解我们的翻译合作者们，各自的背景和研究兴趣。

最后，我们藉这个机会感谢《全球对话》助理编辑Christine Schickert对这项重要工作的付出，并欢迎Walid Ibrahim(来自德国耶拿大学)接任她的职位。■

Brigitte Aulenbacher 和 Klaus Dörre，
《全球对话》主编

> 全球对话以多种语言刊出，请至 [ISA website](http://isa-website.com).
> 投稿来信寄给 globaldialogue.isa@gmail.com.

ISA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GLOBAL
DIALOGUE**



> 编辑团队

主编: Brigitte Aulenbacher, Klaus Dörre.

助理主编: Johanna Grubner, Walid Ibrahim.

副主编: Aparna Sundar.

执行主编: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顾问: Michael Burawoy.

媒体顾问: Juan Lejárraga.

编辑顾问:

Sari Hanafi, Geoffrey Pleyers, Filomin Gutierrez, Eloísa Martín, Sawako Shirahase, Izabela Barlinska, Tova Benski, Chih-Jou Jay Chen, Jan Fritz, Koichi Hasegawa, Hiroshi Ishida, Grace Khunou, Allison Loconto, Susan McDaniel, Elina Oinas, Laura Oso Casas, Bandana Purkayastha, Rhoda Reddock, Mounir Saidani,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on, Nazanin Shahrokni.

各国编辑:

阿拉伯: (突尼西亚) Mounir Saidani, Fatima Radhouani, Habib Haj Salem; (阿尔及利亚) Souraya Mouloudji Garrouddji; (摩洛哥) Abdelhadi Al Halhouli, Saida Zine; (黎巴嫩) Sari Hanafi.

阿根廷: Magdalena Lemus, Juan Parcio, Martín Urtasun.

孟加拉: Habibul Khondker, Khairul Chowdhury, Mohammad Jasim Uddin, Bijoy Krishna Banik, Sabina Sharmin, Sebak Kumar Saha, Mohammed Jahirul Islam, Abdur Rashid, Sarker Sohel Rana, Juwel Rana, Helal Uddin, Masudur Rahman, B. M. Najmus Sakib, Eashrat Jahan Eyemoon, Shamsul Arefin, Yasmin Sultana, Shahidul Islam, Ekramul Kabir Rana, Saleh Al Mamun, Sharmin Akter Shapla, Ruma Parvin.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Angelo Martins Junior, Andreza Galli, Dmitri Cerboncini Fernandes, Gustavo Dias, José Guirado Neto, Jéssica Mazzini Mendes.

法国/西班牙: Lola Busuttil.

印度: Rashmi Jain, Nidhi Bansal, Sandeep Meel, Pragya Sharma, Manish Yadav.

印尼: Kamanto Sunarto, Hari Nugroho, Lucia Ratih Kusumadewi, Fina Itriayati,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Benedictus Hari Juliawan, Mohamad Shohibuddin, Dominggus Elcid Li, Antonius Ario Seto Hardjana, Diana Teresa Pakasi, Nurul Aini, Geger Riyanto, Aditya Pradana Setiadi.

伊朗: Reyhaneh Javadi, Niayesh Dolati, Abbas Shahrabi, Sayyed Muhamad Mutallebi.

哈萨克: Aigul Zabirowa, Bayan Smagambet, Adil Rodionov, Almash Tlespayeva, Kuanysh Tel, Almagul Mussina, Aknur Imankul, Madiyar Aldiyarov.

波兰: Justyna Kościńska, Jonathan Scovil, Sara Herczyńska, Weronika Peek, Aleksandra Wagner, Aleksandra Biernacka, Jakub Barszczewski, Adam Müller, Zofia Penza-Gabler, Iwona Bojadziejewa.

罗马尼亚: Raluca Popescu,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Iulian Gabor, Monica Georgescu, Ioana Ianuş, Bianca Mihăilă, Veronica Oancea, Maria Stoicescu.

俄罗斯: Elena Zdravomyslova, Anastasia Daur.

台湾: 李宛儒, 呂道詠, 洪柏勝, 陳昱嘉, 任軒立, 廖宇雯, 洪崇仁

土耳其: Gül Çorbacıoğlu, Irmak Evren.



在这个主题中,作者们着眼于美国在2020总统大选之后的困境与机遇。文章讨论主题纳入历史的观点,并分析过去十年经济和政治发展带来的影响。针对2021年1月发生在华盛顿的事件,作者展望未来,并讨论我们能采取什么措施,使改变得以可能。



此主题针对欧洲华裔移民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一部份文章以20世纪的移民运动为焦点,另一部分则关注21世纪中国移民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变动。



面对如今的全球挑战,拉丁美洲的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性正逐渐增加。本主题呈现出广泛且多元的拉丁美洲理论所具有的独创性,其有关于全球理论的研究,总能从当地的角度出发。



Global Dialogue 由 SAGE 赞助

> 本期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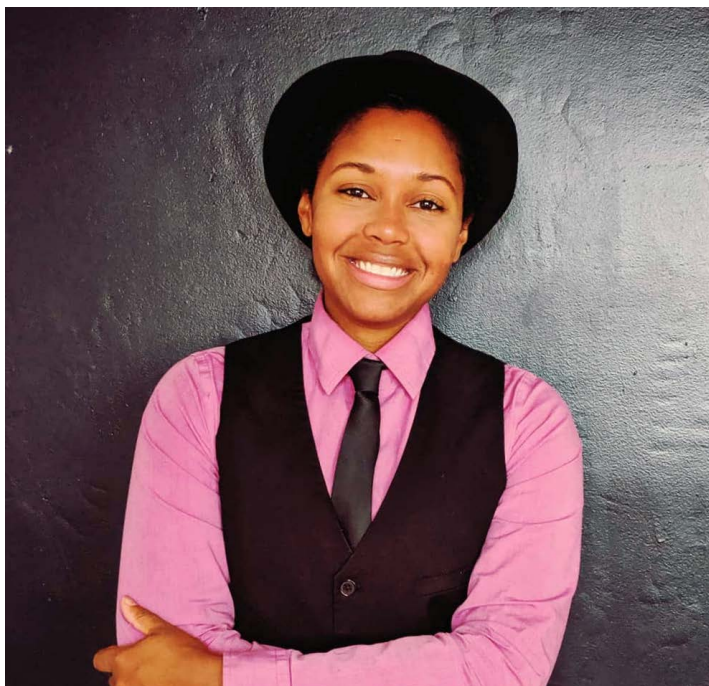
主编的话	2	塞尔维亚华人的身份变化	
		Jelena Gledić, 塞尔维亚	32
> 社会学对话		华裔移民与COVID-19大流行	
BLM的巧思:采访S.M. Rodriguez博士		Martina Bofulin, 斯洛维尼亚	34
Margaret Abraham, 美国	5		
> 美国:困境与机遇		> 理论观点	
还能拿美国怎么办?		极右政权的比较分析	
Peter Evans, 美国	9	Walden Bello, 美国	36
「绝望之死」与民主的健全:			
社会学的挑战		> 拉丁美洲的社会学	
Gabor Scheiring, 意大利	11	拉丁美洲社会学的普世目标	
人力资本		Esteban Torres, 阿根廷	39
Christopher Muller 与 Suresh Naidu, 美国	14	世界典范:一个社会学的新提案	
美国生育正义前瞻		Esteban Torres, 阿根廷	40
Patricia Zavella, 美国	16	连结全球社会学和全球现代性	
为气候正义而战,		José Maurício Domingues, 巴西	42
与拜登、贺锦丽政权		将理论历史化:给拉丁美洲的提案	
J. Mijin Cha, 美国	18	Viviane Brachet-Márquez, 墨西哥	44
基进补偿方案		相互依赖性的再思考	
Marcus Anthony Hunter, 美国	20	Sérgio Costa, 德国	46
		危机的系统理论:忽视的时代	
> 华裔移民在欧洲		Aldo Mascareño, 智利	48
在欧华人处境的变迁		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探究	
Fanni Beck, 匈牙利, 以及 Pál Nyíri, 荷兰	22	Verónica Gago, 阿根廷	50
在法华人:从沉默到行动		迈向后自由语法	
Ya-Han Chuang, 法国, Emilie Tran, 香港		Carmen Ilizarbe, 秘鲁	52
以及 Hélène Le Bail, 法国	24	拉丁美洲的尺度、不平等及菁英	
中国留学生在欧洲		Mariana Heredia, 阿根廷	54
Stig Thøgersen, 丹麦	26	原始积累与法律批判	
布达佩斯的「黄金签证」中国移民		Guilherme Leite Gonçalves, 巴西	56
Fanni Beck, Eszter Knyihár 以及 Linda Szabó, 匈牙利	28		
义大利华人:商业与认同		> 议题开讲	
Ting Deng, 美国	30	《全球对话》波兰团队介绍	58

「欧洲人和北美人视他们的普世性为理所当然,也因此认为自身的特殊性是可以立即普遍地概念化的;拉丁美洲人则因其普遍性受到否定,而必须由其特殊性开始发展。」

José Maurício Domingues

> BLM的巧思

采访 S.M. Rodriguez 博士



S.M. Rodriguez.

替代方案」(即将出版),和「牢房之外:监狱惯习和矫正暴力对狱警的家庭和社区生活的影响」(即将出版)。Rodriguez 正在开展两个创新的书写计划:「学术界的废奴:学者行动和废除奴隶制运动」和「标记为废除运动:纽约的永久殖民性、中产化和废奴实践」。在 SOS(the Safe OUTside the System Collective)组织下的社区组织了多年的活动之后,Rodriguez 加入了 Audre Lorde 的董事会,这是美国最大的有色人种酷儿组织。他们的工作得到了各种赞助、奖励和研究金的支持,其中包括美国大学女性协会(AAUW)的「学术界废奴」博士后研究金(2020-21)和美国社会学协会的少数民族研究金(2014-15)。

S.M. Rodriguez (Samar Rodriguez-Fairplay, 访谈简称SM)博士是霍夫斯特拉大学(Hofstra University)社会学系犯罪学助理教授,同时兼LGBTQ+ 研究主任。他是《酷儿的经济:乌干达的LGBTI权利的跨国组织》(2019年)一书的作者,其中 Rodriguez 对跨国组织和国际资金对在地运动的影响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们的出版物包括「牢狱般的保护主义与永久脆弱」、「隐形问题:跨国的非洲同性恋组织和能见度管理」、「将仇恨暴力定罪的解放酷儿

本次,罗德里格斯接受国际社会学协会前任主席兼高级教务长 **Margaret Abraham** (访谈简称MA)以及霍夫斯特拉大学的 Harry H. Wachtel 教授的访谈。

MA:什么是「黑人的命也是命」?

SM:当人们提到「黑人的命也是命」时,他们通常指的是三种不同但相互关联的事物。第一种情况是,这是一个始于2013年的全球性组织,在美

国、英国和加拿大设有多个分会。该运动的主要目标是打击白人至上主义,制止针对非裔的国家暴力,以及打造集体权力以维持反种族主义的社会。其次,BLM是一个口号,旨在向世界各地的非裔人民呈现一个事实:我们不仅存在也至关重要

>>

要。最后，也许也是最常见的，人们指的是为黑人生命发起的运动(Movement for Black Lives，简称M4BL)，这是由许多关心种族正义的组织组成，这些组织在BLM发生前早就存在了。现在媒体报导的趋势是，无论抗议组织者或参与者背后支持的团体为何，媒体都会立即将所有抗议警察滥用暴力的行动视为BLM。

BLM的巧思之处在于，这是一个所有反种族主义者都可以肯定的口号，这个口号更具有渲染力且传播更快。Black Lives Matter 是千禧世代的 Black is Beautiful 或 Black Power 的运动：与其说是个运动，不如说是个信仰体系，存在已久的哭诉，和集体的召唤。

MA：您在过去的黑人民权运动和当前的BLM运动之间看到了哪些连续性和改变？挑战现状的颠覆性策略有哪些？

SM：在美国，国家社会福利未能完全照顾的人所自组的社群互助已有久远的历史。「互助」需要资源共享，并将资源和责任视为整体社群关系的一部分，这种关系不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上下关系。黑人运动在历史上数次对国家提出改变的要求，但他们几乎从未将国家本身视为解决问题的核心。例如黑豹党的「十点计划」要求政府补偿过去的奴隶制和种族灭绝行为，同时期待由内部社群主导该资源的分配。同样，BLM运动要求赔偿，但不希望这种补偿资源的分配工作落入国家职权范围之内。W.E.B.杜波依斯在《黑人灵魂》提到的有关管理难民和解除奴隶身分人的机构时，指出了国家的局限性。该机构是1870年代专门为保护美国黑人自由和追求有偿劳动而成立的联邦机构，但他在短短7年内就解散，因为它不足以抵抗白人至上主义的暴力(特别是3K党)和立法将黑人身分视为一种罪恶。

我们可以看到丰富也延续的历史进程：从对安全、尊严和免受政治压迫的诉求到黑人妇女和LGBT领导阶层的出现，以及抗议警方的滥用暴力、国家压迫、反种族主义的运动和白人赔偿/有罪不罚的存在。这些改变十分珍贵。我们看到在某些城市，特别是在中西部的城市，BLM游行中的许多抗议者常是白人。从历史上看，这些地区在过去可能只是没有采取这么直接的行动。我们还看到军警和白人至上主义者伤害许多参与

BLM的白人，这些白人是BLM盟友！在「自由乘车运动」中，许多白人(包括许多犹太人)因参加民权运动而遭到殴打，这样的情形和现代支持BLM的白人被打没有甚么不同，但我未曾听闻历史上年长白人被打、年轻白人女性被鞭打过以及两名成年白人被打死。我的意思是，尽管对黑人的压迫一直都在，但白人盟友遭受同样的迫害成为新的现实。我认为这种变化显示国家的压迫进入新的境界：警方的军事化不仅大量见于媒体的报导，以警治的精神复兴了。

MA：BLM能改变美国的系统性种族主义吗？这种结构性的改变需要付出甚么代价？

SM：或许我们应该问的是，我们应该如何改变BLM的运作形式？我们应该将BLM视为一个联合起来的诉求而非只有单一组织和目标的运动。在我的著作中，我探究黑人组织的转型正义和反暴力组织运作。关注这个主题，不只是为了它的价值，更为其踏实的实作，将BLM运动从口号转为社会真实。

MA：在BLM运动中性别、种族和阶级的交织性是如何呢？

SM：BLM是一个从运动刚开始就是个很好的交织性范例。他是由三位非裔女性所创立，其中两位是酷儿，这个运动从刚开始就不是只是为了非裔美国人单方面的受苦而发起。过去在这种反抗警察暴力的历史上较为集中在非裔黑人男性上，这反映了数十年来记忆其实有组织性的聚焦在非裔男性上。我们追悼 Oscar Grant，如同我们知道如何追悼 Philando Castille，我们记得 Amadou Diallo，如同我们懂得追悼 Alfred Olango。这样以种族化男性为主的叙事，让我们在追究警察的谋杀责任和过错时建构一个简洁的叙事，也相对容易简化诉求：例如「追究凶手警察」这类叙事。当我们加入黑人酷儿和女性时，会让意见更为多元以及更多细微差异被看见，这样的情形是前所未有的。这也意味着当由社群媒体为主的觉醒运动出现时，例如 #SayHerName，对于伤害的发生机率、意义和修复的探讨并没有固定的讨论结构。大多数针对黑人女性和酷儿的暴力是因为国家和警察暴力的内化以及使得社群关系弱化。然而，就是这样的交织性让我们

在看待转变时不再是单一目标的视角。这就是 Kimberlé Crenshaw 的理论贡献：当我们设想且重视那些更为边缘的群体的需求，我们才能较为全面地介入。

MA：已经有许多讨论和辩论关于削减警察部门的预算，BLM是如何带起对于刑事司法改革的运动呢？

SM：这种对于社会改革的提议总是遭受相同的论述宿命：下猛药才会引来最多关注。这种直接拿走他们资源的手段听起来激烈，造成恐惧，这就做负相改变。而正向的政治—创造的一带来惊奇。削减警察部门的预算的声音具有许多意义：这是一个包裹在三字口号中的丰富又细致的提议。在许多层面来说，社会学家应该对此感到深厚兴趣，因为这样的运动策略曾由美国社会学鼻祖之一的 W.E.B. Du Bois 在1935年的著作「废奴民主」中阐述过：他主张我们要创造出新的运动模式，否则无法影响废奴的运动。我们必须投注时间精力来打造肯认黑人生命的机构来取代结构性的奴役。这样才能在反抗后有直接的机构来取代旧有的，否则旧有的势力会再演化。现代的社会运动领袖不仅提出甚么应该在体制中被抹除，还主张应该要介入什么样的新行动。

MA：媒体形塑的BLM如何影响种族正义的组织形成？

SM：有趣的是，我发现在川普时代这种白人国族过度展现的时候，媒体对黑人抗议的行动报导是站在比较同情的立场。主流媒体推动了一种虚构式叙事，Achille Mbembe 称作「被创造的危机」，来支持黑人生死的紧急状态，尽管迫害黑人和国家暴力持续，过去那种看起来不具正当性的诉求现在都合理了起来。

在我的著作「酷儿的经济」中，我已经提过媒体的关注度虽在更进一步厘清问题上帮助有限，但能提高外界的资金投注。图像越轰动和激烈，获得的支持就越多。但是，由此而获得的支持很大程度上仍是肤浅的，参与度随着时间下降。媒体的报导造成大量关注但最终引发运动的巨大财物损失。许多个人捐助者和基金会都掌握了慈善捐赠的管道，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自己的形象。媒体创造了运动的文化声望基础和最新的关

注资讯。在我先前的作品中提到，乌干达的《反同性恋法案》和这种资金流动实际上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今年夏天，我以一个种族正义组织的董事会成员名义发言，BLM运动意味着种族正义倡议正在发生，当人们在设想该政治危机时，也无法想像会经历一个类似的财务红利。

MA：BLM的进步主义是如何影响美国的选举和政党政治？

SM：黑人进步主义虽然在选举时是边缘议题，但总是影响着主流政治。例如黑豹党的免费早餐计划，该计划在1960年代成为政治核心，并于1975年在美国公立学校广泛实施。今年总统大选有相似的情形，黑人进步主义运动倡议优先考虑对过去的奴隶制进行赔偿，提出四个民主社会主义倡议：全民医疗保健、取消学贷、进入公立大学以及削减军队和警务预算，以投资于社区资源（如日托、公立学校和社福机构等等）。再次，我们看到黑人进步主义者没有得到理想上的左派支持，反而是一位民主党候选人不愿在总统初选辩论中就奴役非裔美国人获得赔偿的可能性进行讨论。然而，历史显示黑人进步主义的主张是能裨益美国整体的。

MA：社会学家已经挑战许多我们的思考模式和做社会学的方式。有哪些社会学者影响你思考BLM运动呢？

SM：社会学家长期以来对「全控机制」进行了批评，而植根于这种批评的学者组织起来使社会摆脱这些标籤、监视和惩罚。在我目前的书写计划〈学术废奴〉中，这些学者都采用身为废奴主义者的语言和身份来书写。

我想先讚誉 Mariame Kaba 的学术成果。她一直是废奴主义思想和实践的重要学者，她的学位是社会学。专门在高等教育机构中的社会学的工作是一回事，而看见社会学如何实践是另一回事。Kaba 一直影响着芝加哥的BLM发展轨迹，并为为黑人生命运动做出了许多贡献，其中包括黑人青年计划（Black Youth Project 100）。

许多学术工作的积极运动者极大地影响了我的观点和工作，包括 INCITE! 这个组织的



2020年6月14日星期日，在纽约布鲁克林大陆军广场，加勒比人领导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集会。来源：Margaret Abraham。

创始成员 Beth Richie，还有创意介入的创始人 Mimi Kim 和 Liat Ben-Moshe，他们让我们在运动和学术研究中，将身心障碍者置于分析的焦点。我认为这三位女性确实处于知识创新和中止监禁的行动先锋。

在美国以外的地区，我的灵感来自德国的 Vanessa Eileen Thompson 和乌干达的 Sylvia Tamale。Thompson 说明了社运份子采

用的抵抗科技来中止反黑人和反移民在德国和法国的国家暴力。女权运动者 Tamale 致力于倡导性别和性正义数十年，同时与公众合作以改变暴力文化。■

来信寄至：

<sm.rodriguez@hofstra.edu>

或是

www.smrodriquez.com

> 还能拿美国怎么办？

Peter Eva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美国·ISA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RC02)、劳工运动(RC44)和社会阶层与社会运动(RC47)的成员

在分析美国过去四年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有必要展望它的未来和可能。
来源：创用CC。



白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美国已成为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指标象征。现在，美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全球发展的先驱吗？如果是的话，21世纪的美国资本主义未能维持其工人阶级在20世纪时的福利标准，这部份失败的政治后果，将会对世界所有公民产生影响。

要去解读美国混乱的进入21世纪的源起和影响是一项分析性的挑战。以下五篇文章是回应此一挑战所做的努力，有着简明扼要的分析，着重于美国政治经济的特定领域，并探讨美国政府失能的问题。尽管他们称不上是全面性的概述，但也算是富有洞察力和批判性的分析，这些分析对于未来生活在美国（或在美国阴影下生活）的人所可能受影响的相关议题，提供丰富的讨论基础。

Gabor Scheiring 的讨论从一项美国幸福感下降的指标开始——许多没有大学学历的白人工人因「绝望而死」而使得死亡率上升。因

市场趋动造成工人阶级的生计和社区的破坏所导致的绝望死亡，促使工人阶级支持右翼民粹政治。

白人工人阶级因「绝望而死」也是 Christopher Muller 和 Suresh Naidu 研究指出的显着征状，但 Muller 和 Naidu 认为这是因学历所产生的社会排除和剥削，进而产生政治鸿沟。通过大幅降低就学成本来扩大获得大学学历的途径可能有助于弥合鸿沟，但他们认为，建立跨越学历鸿沟的有效联盟更为重要。穆勒和奈杜认为此类型联盟的建立将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左派的责任，例如，这些左派成员应该要将自己所学贡献在帮助工人阶级组织，例如工会。

Pat Zavella 文章的书写主题由工人阶级生活世界的破坏，转移到贫穷有色人种的女性移民的持续斗争上。与谢林的论点（国家是新自由主义的帮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扎维拉认为国家对女性生育权的压迫是对这些女

>>

性的生活和家庭的核心威胁。然而，对抗国家而非对抗整个资本体制可能有助于女性组织抵抗运动。对于扎维拉而言，争取生育正义的核心来自于有色人种女性所领导的社会运动之间的广泛合作，过去在抵制保守派上已赢得了一些出乎意料的胜利，她们在与拜登政府的对抗中也同样全力以赴。

走向低碳社会的过渡期通常被视为技术官僚所需面对的问题，但 Cha Mijin 的文章清楚地表明，具包容性的将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有色人种社群整合起来，是迈向低碳社会成功的关键。争取气候正义的斗争需要建立合作联盟——「创造高品质的工作与减少碳排放是不可分的」，而且在政策上必须照顾到被迫受化石燃料排放污染的有色人种社群。在思考减碳排放时如果忽略对社会和经济层面的考量，这样的策略不仅有失公平，也难以联合广泛的支持来对抗化石燃料带来的经济诱因。

Marcus Hunter 撰写的文章是五篇中的最后一篇，结合了深厚的历史深度和对解决方案的全面愿景，从在美国资本主义形成过程扮演重要角色的奴隶制着手，亨特强调要改正400年来种族资本主义中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社会、文化和经济不平等现象所需的重要转变。然而，亨特提倡的多层面赔偿计划并非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表述，而是从非常具体的提案开始，例如国家真相委员会、种族伤害治疗和转型(TRHT)委员会的立法。

这五篇文章在分析角度和焦点上虽有不同，但它们在判断美国种族问题和确立前进方向上有共同的主题。

川普政策的破坏性影响是这些分析家的共识。2021年1月川普支持者对国会大厦的攻击显示，川普有能力激发白人工人阶级的愤怒，但也揭露了美国政治失能的问题。早在一月攻击国会大厦事件发生之前，Scheiring 的文章就指出，新自由主义数十年来对工人阶级生活带来的破坏，未能得到修复；也因此，他认为川普主义的崛起很可能只是一连串伤害民主的政治运动的序幕。

不管COVID疫苗接种或新上任的总统都不能解决这里提出的问题。这些作者提出的策

略主要是探究21世纪美国政治功能失调的结构性根源，尽管在华盛顿已建立了新的政府，但这些问题仍将继续存在。Zavella 得出的结论是，拜登的当选并不会改变未来仍有许多艰苦的困难这一事实。Cha 则坚信拜登政府领导下的绿色新政似乎前景黯淡。

那些对美国的未来感到焦虑的人，并不会因为拜登的当选而松了一口气。对于自己提出的建议，这些作者都没有给出足以说服我们的结构性因素。他们也都没有指出，有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正在聚集，试图对抗美国经济和政体的衰落。对于那些寻求安慰的人来说，并没有任何迹象能让人乐观地看待未来。

然而，我也不会在这边作出末日的预言。这些分析并不止于指出问题所在，还设想出了一系列创新的、促进变革的方法。以美国最深层的结构性问题——种族主义为关注对象的 Hunter，也提出了非常乐观的看法：他认为「承认和保存真相，并有意义地修复受创伤的种族群体，可以为美国带来转型」。他的每篇文章，都指出了政治势力有可能在渐进式变革中起作用。他认为在国家的层次做变革已经没有希望，且应该将重点放在较小规模的具体目标。Cha 以州层级组织成功的气候正义联盟为例，尤其是那些包括工人阶级的组织。Zavella 则直接关注跨性别、种族和阶级认同的联盟，认为他们是进步能量的核心。对于 Muller 和 Naidu 而言，关键是受过教育的左派人士，在帮助建立、维持工人组织尚有多少意愿。Scheiring 断言，就连社会学家在这件事情上也能扮演重要的角色，其能够分析经济萧条与劳工白人的「绝望之死」之间的复杂因果路径，以及绝望如何被与政治连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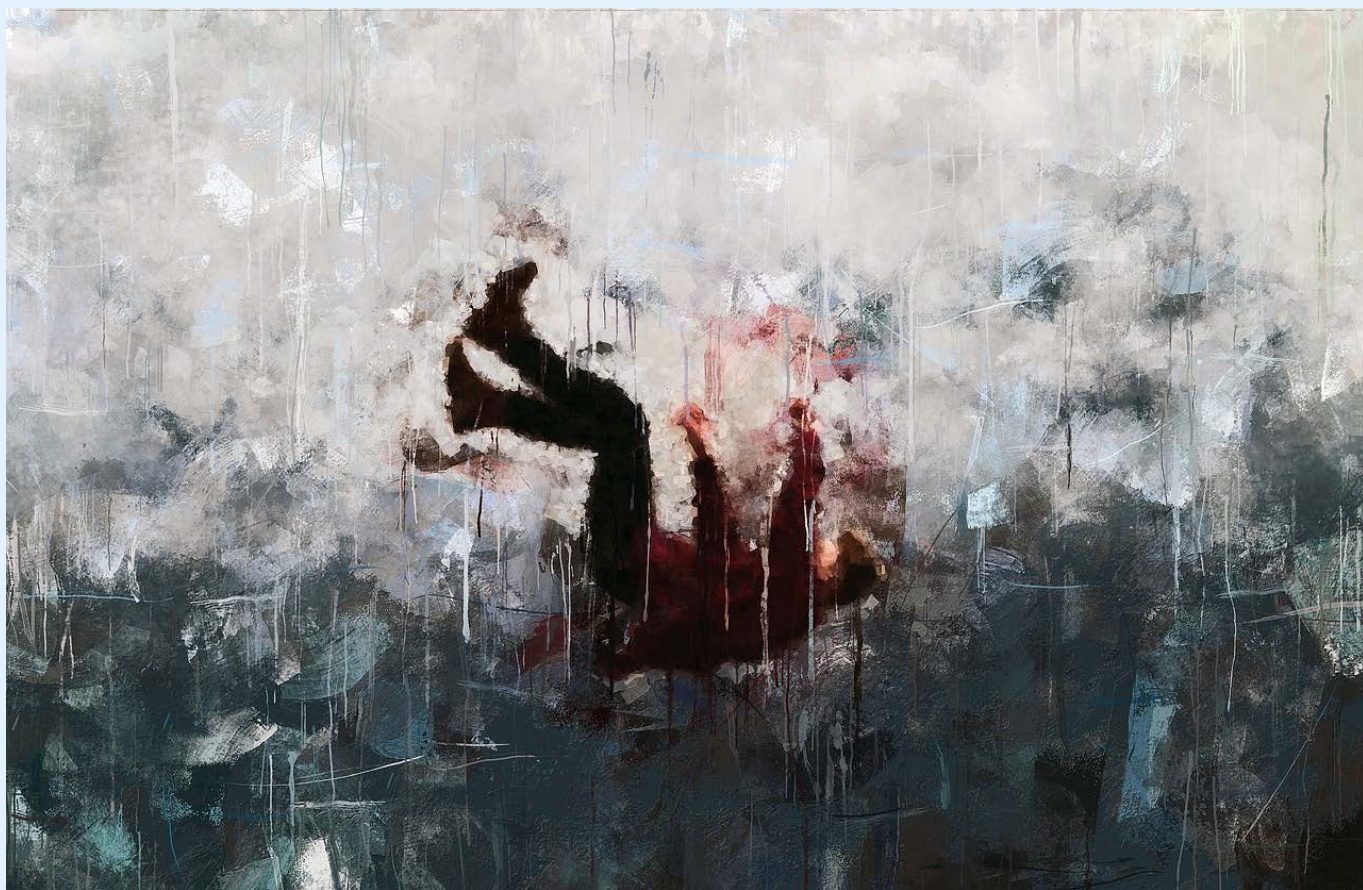
尽管关注的领域截然不同，但作者们指认出了不同的行动者，他们在不同的领域中取得成功，而其成功相互交叠，并扩大了在其他领域进行变革的可能。这些行动者的组合提供了一套特殊的、相互交织的行动计划；其并非有确切行动方针的蓝图，而是关于我们「可以做什么」的部分草稿。■

來信寄至：

Peter Evans <pevans@berkeley.edu>

> 「绝望之死」与民主的健全： 社会学的挑战

Gabor Scheiring, Bocconi University, 义大利, ISA经济与社会(RC02)、社会变迁与发展社会学(RC09)、健康社会学(RC15)、政治社会学(RC18)等研究委员会成员



自世纪之交以来，美国中年人的死亡率一直在上升。这一死亡浪潮的三个直接原因是自杀、吸毒过量和与酒精有关的死亡——所谓的「绝望的死亡」。

来源：创用CC。

新冠病毒的流行暂时减缓了民粹主义的崛起，并为政治局势卸下不少压力，也有助拜登在2020年获选总统。然而川普带来的影响并不仅限于白宫，川普主义以及国族民粹主义，也显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生存危机。如果拜登政府未能解决潜在的紧张社会局势和经济动盪，或是受到共和党阻

>>

碍政策进行，那么第二波的国族民粹主义浪潮将势在难免，甚至可能有另一波更糟的川普主义回归。在此情况下，社会学应以政治为关注对象。

民粹主义试图建立与非菁英人士的直接连结，并利用此连结反对政治菁英。有时这种方式可以推进政治资源重新分配，打击根深蒂固的特权阶层。不过在其他情况下，民粹主义可能提倡反动或保守的议程，并声称其利益以社会大众为对象，却以社会中的少数群体为受众；其对「菁英」的打击，通常也并未针对真正的经济特权阶级，反而加深了这种不平等。当前的民粹主义浪潮，则属于第二类：反动的右翼民粹主义。本文中民粹主义的意涵即在于此。

政治学家提供了针对当前民粹主义浪潮的学术论述。他们的专长在于分析选民的态度和政客的手段。要理解民粹主义，了解其政治上的战略——如何击破自由民主制度所建立的社会形式与机构——显然是至关重要的，毕竟民粹主义政治家并不是在一个真空的社会中运作。也有些人强调反自由文化的态度，这些态度决定了民粹主义的政治诉求。但是，民粹主义不仅仅是种族主义。将民粹主义者的选民视为种族主义者，会使自由主义者忽略工人阶级社群的政治结构，这是一个致命的政治错误。

与政治学相反的是，社会学在至今以来的民粹主义论辩中，一直扮演着较为边缘的角色。社会学家强调的是经济变化——包含全球化、去工业化以及朝向高技术密集工作的转变——如何改变了传统的选举结盟对象。这些选举结构的改变破坏了社会民主党的选举基础，并促使工人阶级选民向右派转移。其他学者则表明，当左派在社会和经济政策上向右倾斜时，民粹主义的右派将会获胜。对于此现象，质性社会学家与民族志学者则提及数十年来的新自由主义如何对日常生活和工人阶级社群造成严重破坏，最终削减了阶级认同、为国族主义动员打下基础。

有趣的是，作为资本主义存在危机的表征，铁锈带工人预期寿命下降，以及随之而来的健康不平等加剧现象，至今仍未引起多数社会学家的关注。这类「绝望之死」的震撼案例不只在美国发生，在世界其他地区，如英国和东欧国家，工人阶级的死亡率和健康不平等也在不断增加。

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和欧洲的预期寿命一直在增加，这是医疗保健、福利国家和经济增长的发展所带来的好处。然而，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正在经历一种完全不同的趋势，这使得美国成长模式备受质疑。自千禧年以来，美国中年白人的死亡率一直在增加。美国黑人工人在三十年前经历了类似的危机，因为第一批大规模关闭的工厂对城市社群造成了严重破坏。正如普林斯顿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 Anne Case 和 Angus Deaton 在书中强调的那样，绝望之死在2017年杀死了158,000名美国人，相当于一年中每天都有一架载满乘客的波音737坠机。

在美国，这几波死亡的三个直接原因是自杀、药物过量和与酒精相关的死亡。这就是 Case 和 Deaton 所说的绝望之死。它们反映出人们对未来的感觉和对自己生命的价值。绝望之死呈现不均匀的社会分布。绝望之死人数的增加仅限于没有大学学位的工人，而社会变迁的混乱是导致这种情形的重要原因。

失去稳定的工业工作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工人阶级的社区，并使其文化瓦解。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新工作往往更加不稳定，且有更多的临时工，自顾者人数也出现上升。冰冷的商业公司策略、缺乏集体的组织力量以及被资本钳制的国家是这一转变的核心。过去构成蓝领工人骨干的城镇如今已成为社会、经济和健康问题不断恶化的绝望的家园。美国铁锈带的去工业化推动了工人阶级的瓦解，并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心理压力和绝望情绪的上升。这种环境是情绪和精神问题增多的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情绪和精神问题通常会转化为其他健康问题和酒精或药物上瘾。

尽管 Case 和 Deaton 对绝望的死亡人数进行了开创性的调查，但经济学的学科限制侷限了他们的分析。他们支持社会学者关于去工业化带来不利社会后果的文献，强调经济转型带来的去工业是健康不平等的决定因素。但是，他们没有继续深入这些机制的复杂性，并得出必要的理论和政策结论，而是强调美国经验的特殊性，并论断必须以管制药物和建立真正的自由竞争市场来作为解决之道 (Case and Deaton, 2020)。

在美国预期寿命下降的前几年，东欧经历了类似的死亡率上升情形，这样的规模在已开发国家的和平时期是空前的情况。在1990-99年，光

>>

是俄罗斯就有326万人死亡。后社会主义时期的死亡率危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以及随后的几篇期刊文章的主题——也与东欧的工业和就业结构迅速变化有关。在匈牙利的后社会主义死亡率上升期间，去工业化可能造成了三分之一的失业男性死亡，而跨国公司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并未转化为健康状况的改善。俄罗斯的数据也证实了由去工业化和大规模私有化造成的经济转型所带来负面的社会心理影响。然而，自1990后半以来东欧的预期寿命又开始增加。美国白人工人阶级的预期寿命则相反地下降了二十年。

人的健康和民主的健全是交织在一起的。那些在受疾病困扰地区的人们以及面临工作不稳定和负向动力的工人，更倾向于支持民粹主义。川普在美国那些人民健康地区低落的受欢迎程度、英国脱欧投票在受财政紧缩打击且健康低落的地区受到较高的支持，以及 Lega Nord 在意大利去工业化小镇的工人中得到较高支持的情况，都是经典的例子。

即使如此，那些政治强人仍向选民保证，他们将拿回自己国家的控制权、就会有更好的未来，虽然这样只是让那些已经受害的群体处境更加艰难。政治菁英才是这种脱欧和川普的新自由主义变种出的国族民粹主义得利者。即使这样的不平等长远来看破坏了经济发展，但重分配可以在短期内促进增长。因此，国族民粹主义者还是可以吸引支持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外国投资者和中上层阶级的支持。

民粹主义者并非当今多重危机的根本原因。他们只是在利用既有的经济结构带来的危机，以提供自己政治机会的政治企业家。社会学在分析这些潜在的经济结构转型上，具有巨大的潜力，正如《全球对话》的分析所强调的，社会学观点可以为分析民粹主义带来的好处。

目前有许多中间派政党紧守着政治现状，不过这并不足以阻止现在的民粹主义浪潮，也难以修补经济结构转型所带来的「绝望之死」问题。现存的人口或民主方面的问题需要深远的改革。透过其分析，社会学家其实有很大的力量，能够去分析这些工业化改变后的问题，找出复杂的因果关系、找出那些身受工业发展转型而健康受害的人与民粹主义间的机制，并且能够补足经济学家和科学家的分析。民主的健全和人民的健康是相互依赖的。■

來信寄至：

Gabor Scheiring <gabor@gaborscheiring.com>

参考文献

Case A and Deaton A (2020) *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人力资本

Christopher Mull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柏克莱, 美国以及 Suresh Naidu, Columbia University, 美国



Arbu 绘。

在极端的财富分配和收入不平等的情况下，COVID-19破坏经济的现况似乎为革命形势配齐了最完美的条件。考虑到社会动员理论中最机械式的经济决定论：高度的结构性不平等加上短暂的经济冲击和已经衰弱的国家能力，这些应转化为国家危机和潜在的政权更迭。至少，这样的理论可以预测 Bernie Sanders 将赢得压倒性的胜利，因为美国的工人阶级能够聚集到他以重新分配为论点的舞台上。

但是相反地，我们在政治上一直处于僵持的状态，这很可能会导致国家进一步瘫痪。在未来2020年的大选上，我们可以预见验尸的人数将会大大增加。但是在这种背景下逼近的现实是，世界各地的教育形式仍是左派得票数，甚至是左派激进主义最有力的预测指标。我们应该如何理解Piketty的商人右派(Merchant Right)与婆罗门左派(Brahmin Left)之间的分裂？这是否意味着必须放弃唯物主义式的政治分析方法？我们可不这么认为。但是，可能需要透过以学历建立的排他性、剥削所产生的社会分化，进行更仔细的分析以补充上述之不足。

思考一下这两点。

首先，至少从1960年代开始，大学就成为了一个从制度上再现左派思想的重要场所。保守派就对此感到哀悼，当我们面临气候灾难并尽可能避开流行疾病之时，令人惊讶的是，竟然有许多人为了畸形的校园政治而坚守着夜晚。但是毫无疑问地，大学以及大多数的文化产业都被民主党的忠实支持者彻底占领了。在研究社会领域的部门中，没有比这更真实的了：甚至公认是保守学科的经济学教授也以4:1的比例倾向于民主党（社会学则是44:1的比例）。而从大学继承政治的不只是中间派民主党的支持者，也有许多左派人士。

第二点，自1970年代以来，那些没有从大学毕业的人，他们的财产无论从绝对意义上或是相对意义上都在减少。从1970年代末到2000年，大学保费稳定增长。如今，即使学生的债务危机和2009年的经济衰退危及了一代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但没有从大学毕业的代价仍旧无法质疑，在以下的发现中就能够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在Anne Case和Angus Deaton的记录中，没有拿到学士学位的人死亡率惊人地上升。甚至是私营部门的工会，即工人阶级组织的原型，也被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所占据，而大多数的低薪工人依旧难以达到工会化。

通常这两点我们会分开讨论，但若将它们放在一起思考会很有帮助。借由这样的思考方式，我们可以发现大学逐渐说服了他们的毕业生，诸如全球财富税或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等稳健的思想，但也同时拓宽了他们与我们广大选民之间的社会、经济以及言辞上的隔阂。

而企图争取人们支持的社会运动也因为这种隔阂形成了僵局。再现的左派势力复甦了网路上的公共广场，为主流媒体带来了重塑社会的强大思想，这种思想在几年前甚至还不被人们重视。但是，尽管左派与中心之间、或左派内部在网路上的辩论很重要，但这些争论完全是由大学生学历的人内部进行的交流。这表示1982年后出生但没有大学学历，这些约60%的人并没有对社会有太大的关注。而这些没有大学学历的人，通常生活重心都围绕于家庭、教堂或是社区中心，他们对社会的关心和行动仅仅关乎于那些试图将他们引导到政策需求的作家世界。

显而易见，如果要缩小收入跟财富的不平等，就需要缩小有无大学学历的人之间的经济鸿沟。虽然没什么成效，但却可能很重要的就是要同时缩小社会鸿沟；接着要跨越教育界限，在受过大学教育的左派和未经大学教育的人之间建立社交网路，将这些网路转变为由工人阶级领导的组织，但我们该怎么做呢？

其中一种策略是增加人们读大学的机会，降低读大学的财务开销和大学教育的私人收益。大学要为左派做的事，就像军队为右派做的事那样，右派就以这一事实为理由要求大学退款。借此，我们就有理由要求开放给所有人的免费大学教育，以及为高等教育和基础科学研究提供更多的公共资金。但另一方面，也由于大学教育的投资报酬取决于其稀少性，所以这将缩小有无大学学历的人之间的经济差距。但即使压缩了大学学费和参与成本，仍会有一大部分的人不想上大学，这样教育鸿沟上的交流分歧依然会存在。

另一种策略则是改变我们言词交谈的方式，减少与那些在政治上跟我们想法相近的人争论理念上的小分歧；增加关注那些强调根本意义观点、与我们理念相差甚远的人。当然，其中一个作用是使我们的思想更容易被广大听众所接受，展示出能吸引人们去服务社会的道德观念；并指出能够吸引人们更进一步地参与政治和关心社会

的道德、慈善观念之间的关系。但是即使我们广泛地传播这些思想，也顶多只能做到目前的程度，像是能用对话反映意见或分享参考资料的社交网路，人们可以在不隶属于其中一员的情况下就能听到一个想法或得到一项资讯。Sanders的沟通方式并非是缺乏管道、难以触及的，然而，只有当移民、工人和移民工组成的组织，在其会员的网路中响应这些讯息时，这样的沟通机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因此，前两种策略只有在能够有利于建立、维持工人阶级「组织」的情况下才可能有效。受过大学教育的左派人士有办法发挥作用吗？其中一个办法或许是建立毕业生和摇摇欲坠的学术界以及科技、媒体工作者的工会，使知识分子的派系融入劳工运动；另一个办法则是扩大工会和其他组织里「家庭知识分子」的人数和影响范围，使这些组织里的人可以在大学外追求知识性的生活，而不受专业性压力和学术偏见的影响。在过去，这类知识分子的工作通常是战略性的，但将来也有可能越来越具有科技性。有些人可能会使用他们从大学中学到的技术来强化组织里的法律、技术和行政管理能力；有些人则可能会用实验性社会科学下的工具来打造组织系统，就像麻省理工学院的贫困行动实验室(MIT's Poverty Action Lab)中以赞助为主的开发模式一样。举例来说，当代工会就是一种需要软体基础架构、分析的数据驱动组织，而这些技术通常只能由拥有专门技能的人员组织和执行。这种行动可以以运动律师为原型，在运动律师的原则中，是让受过大学教育的左派分子为无学历人士所经营的组织工作。

为了吸引受过大学教育的左派人士对超越阶级的议题产生兴趣，似乎有必要将这三种策略结合起来：第一，努力提升大学入学率；第二，改变左派人士的文化和言辞方式，以包容各种推论方式在个人背景上的差异(也许可以透过执行公开的尊重准则达到这点)；第三，放弃组织中事实上应对美国工人阶级负责，却由基金会、政府和以赞助为主的组织占据的部分。■

來信寄至：

Christopher Muller <cmuller@berkeley.edu>

Suresh Naidu <suresh.naidu@gmail.com>

> 美国生育正义前瞻

Patricia Zavel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美国



川普执政期间，美国各地举行了众多抗议和反对堕胎禁令和限制的集会，这是其中之一。

来源：[flickr](#)保留部分权利。

生育治理是川普的政策核心之一，其试图监视、控制女性的生育行为，也借由反堕胎论述，迎合福音派基督徒等支持者的立场。在移民议题上，川普政府也呈现出与面对生育正义时相似的政治及意识型态；他将移民描述为对美国国家安全、经济、身份认同的威胁，更指称这些人「不配」享有特定权利，并在政策的引领下推动了前所未有、违背法治精神的议程。

生育政策和移民政策皆以有色人种女性为主要对象，显示两者之间是互相连结的。除此之外，川普面对COVID-19的无能，更造成大量人员死亡。受到限制的有色人种与移民，只能选择在较危险的前线工作、住在拥挤的家里，成为这场疫情中最大的受害者之一。

《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是生育正义议题的焦点之一，这项法案使女性更容易取得避孕、癌症检查和产前护理等预防性的医疗资源；却受到反对方大力反弹，甚至推动废除法案。虽然川普没有顺利废除这项法案，他仍然成功地在许多方面，剥夺女性取用生育医疗的权利，例如废除了 Title X 计划，这项补助计划为四千三百万名国内外的低收入女性提供

医疗服务。此外，川普政府还资助提倡禁慾的青少年怀孕预防方案、默许医疗人员歧视LGBTQ病患、指派了将近两百名可能危及女性堕胎权利的下级法院法官，以及三名最高法院法官。

政府当局在打击有色移民上，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在史无前例的限制性移民议程下，川普将拉丁族群妖魔化，并实行了超过四百项政策变革，包含：禁止穆斯林国家的旅游人口；将难民的通行人数减至1980年以来的最低数量；结束来自十个国家、四十万名难民的收容；设立更难通过的合法永久居留权与公民权门槛；规定移民不得在通过边境以外的情况下申请庇护；以家庭与帮派暴力作为庇护所的核心；进行庇护申请者的计数，强迫他们在收到通知前待在墨西哥；进一步限制移民获取福利的权利，如取得食品券的资格。川普政府的「零容忍」政策使数以千计的儿童与父母亲分离，拘留的处境更导致孩童照顾的忽视，甚至虐待、死亡。这些情况尤其发生在少数族群与跨性别的移民，以及被驱逐出境的移民身上，也使他们面临COVID-19与其他生命威胁。移民女性受到官僚主义的压迫，在拘留期间被迫绝育、甚至不能合法地堕胎。

对于低收入女性，特别是有色人种女性而言，反生育正义以及反移民立场的政策，为她们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这些政策赋予特定州区反对堕胎的权利，而全美国有六成女性生活在这些州区。黑人女性与少数族群女性的产妇死亡率显著增加，反映着反对派在打击生育正义上的成果；那些因身份资格未被授权而遭到限制的女性，对于要求食品券等公共福利，或是寻求产前护理、避孕等医疗服务感到恐惧；同时，LGBTQ 族群也在健保制度中面临歧视。

女性——尤其是有色人种的女性，也不断尝试反抗这些压迫。他们公开反对川普针对弱势族群在各方面的压迫；广大的倡议团体也时常集结，共同对那些反动的政策与作为发起挑战，并推动更进步的立法，试图保护人民的性、生育、健康等权利。这些团体在新的政府上台后，也将持续监督、对拜登政府施压，以消除长久以来的不正义，就像他们在面对川普政府时一样。

最高法院的消息指出，《平价医疗法案》有可能不会被废除，而拜登政府必须负起接下来的责任。他们应该要修补关于避孕保险的漏洞、让反歧视的保护机制重新运作，并将可能拒 LGBTQ 族群于门外的法规扭转。他们也该重启 Title X 计划，大幅注入计划基金、取消禁欲取向的青少年怀孕预防，并鼓励 LGBTQ 的友善与接纳。

拜登政府应谴责反堕胎的恶行并撤销海德修正案 (Hyde Amendment)，以实现人民的堕胎自主权。海德修正案可能导致上百万已借由联邦计划取得医疗保险的人，无法获得堕胎的保险。拜登应该透过立法推翻海德修正案、扩大医疗补助范围，并促进远程医疗的发展、修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于安全堕胎药物的使用限制。将种族主义视为公共卫生的危机，将有助于发展健康照护的可及性，以及健康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带来新的政治气象。

关于移民议题，拜登已经表态未来会推翻许多川普的政策。古巴移民 Alejandro Mayorkas 已被任命为国安局局长，他曾担任「儿童入境暂缓行动 (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的领导者，并将关闭一

处拘留所，以表明拜登政府将扭转过去违反法治精神以及仇外氛围的态度。不过拜登对于 Cecilia Muñoz 的任命令人担忧，她曾在欧巴马执政期间，为分离家庭的政策辩护。唯有透过司法部长撤销对于独立移民法官的限制，拜登才可能结束家庭分离的限制，并为寻求庇护的人们开放边境。任命更多的法官来结束积压的移民案件，也是重伸移民正义的重要环节之一。对于生育正义打压可能会危及移民的处境，同样地，若有支持移民的政策被设立，生育正义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一个移民友善的政府，将为移民女性在生育医疗及公共福利上，带来更多的便利，也会提升她们的归属感。抵制川普的运动，将很大程度地影响这两个议题未来的发展。

生育正义的社会运动由有色人种女性所领导，他们为那些被边缘化的族群发声——包括移民、穷人、LGBTQ 族群、年轻人、障碍者等等。这个运动结合交织性与人权，从整体的观点出发，提倡结构性的改革，并指出性权利和生育权利，和那些试图实现平穷正义的政策是相连结的。生育正义运动的宗旨，是倡议女性在不受强迫或虐待的情况下生育子女的权利、在不受限制或批评的处境中终止妊娠的权利、在健康环境中抚养子女的权利，以及身体自主和性别认同的权利。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项运动在全国30多个非营利组织的努力下，参与于草根组织的政治社会化、选民动员之中；他们也致力于文化迁移的事务，尝试以正面的文化意象、尊重民间信仰与传统的方式，使那些不稳定的议题得到控制。这些组织进行初探性研究，将发现提交至联合国，并开展目标明确的运动、为女性提供教育与赋权、提起诉讼、通过进步的立法，取得卓越的成果。生育正义的倡议组织和提供生育医疗服务的机构，与推动生育、公民权相关政策的团体共同合作。

无论这些社运团体的关注焦点在于生育正义、移民权，或是 LGBTQ 和女性权利，他们都将继续为了性权与生育权推进拜登政府的作为。未来将会是一场抗争。■

来信寄至：

Patricia Zavella <zavella@ucsc.edu>

> 为气候正义而战 与拜登、贺锦丽政权

J. Mijin Cha · Occidental College · 美国



这是一幅涂鸦，呼吁人们关注解决气候危机的必要性。
来源：[flickr](#)。保留部分权利。

川普政府在之前为争取第二届任期，曾保证会对灾难性的气候变迁有所作为；但相较之下，拜登与贺锦丽执政下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的前景似乎一片暗淡。尽管新任总统拜登对气候行动的诺言比以往任何政府更具有野心；但事实上，不论是绿色新政(GND)未来的前景或是他们对计划的企图心都在慢慢消失，更不用说可能抱有敌意的参议院将严格地限制新政府。如果联邦政府下的绿色新政没有什么前途，问题就变成了：州政府和地方是否能够达到一定的程度的努力，以实现公正合理的低碳转型？只有在社会和经济正义的问题被纳入气候政策讨论时，州级单位的气候行动计划才可能提供一个公正低碳转型的方向。

尽管保守派将绿色新政当作一种能够**胁迫控制政府的武器**。但其实绿色新政并不是一项详尽、有规范性的法规。相反地，它是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呼吁联邦政府去采取远大的凯恩斯

(Keynesian)计划，在为期十年的期限中处理不平等与气候变迁的双重危机。十年的期限正符合专家们的共识，也就是到2029年前必须大幅减少温室气体，以抵御气候变迁带来的严重影响。在绿色新政中，若能瞭解气候变迁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就能在视野上超越狭窄的、技术官僚的减碳框架。此外，应该在研究气候变迁时，尝试理解人们的物质条件，以考量社会和经济层面；而不是将气候变迁作为一个单独、特殊且具挑战性的研究途径。

在倡导气候变迁之时，融合社会和经济因素的考量是当前急需发展的方向。从过去目光短浅的碳税或排污交易计划(cap-and-trade program)等等技术官僚的解决方案转变，当前整个政治领域的气候倡导者都开始**聚焦于气候变迁的三项指导原则**，将社会和经济纳入气候政策中思考。像是曾被提及的「标准、投资和正义」，在不同气候倡议运动之间的共同点，就是呼吁零排放或净零排放；对低碳排放部门和基

>>

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公共投资；还有关注于社会和经济正义——创造友善、具有工会环境的工作；改变化石燃料工人的待遇和社区环境，并保护在气候变迁之下会最先受到冲击伤害的边缘社区。

鉴于新任总统拜登曾宣布会[优先处理气候变迁的议题](#)，也任命了一位负责处理气候变迁的总统特使，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气候变迁会成为拜登与贺锦丽执政的新政府优先处理的议题。但尽管政府承诺会应对气候变迁是让人欣慰没错，但在实现低碳转型这条路上的各个层面依旧是困难重重，因为社会和经济层面中确保「公正」转型上的考量点，最容易受到政治上温和派阵营和敌对的共和党参议院抵制。[温和派民主党在大选后马上就针对改革上的问题发起攻击](#)，例如全民医疗保险(Medicare for All)和停止向警察拨款等，而这也显示了执政党在敌对参议院中，将不会获得种族和经济正义议题向前发展所需的强大支持。

在无法预料联邦政府对于低碳未来会采取什么行动之下，最好的情况还是人们将注意力转移到州级单位上，这样才可以迈向公平的低碳转型。实际上，甚至在川普执政之前，各州就已经处于计划推动气候政策的领先地位上了。但就联邦政府而言，这些气候政策是否公正仍取决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当加利福尼亚州采用排污交易计划时，环境正义的倡议者就因为计划带给环境正义社区的负面影响，而[决定提起诉讼，要求停止该计划](#)。最终诉讼并没有成功，提起诉讼的组织还受到了传统环保组织的强烈反对。最近针对排污交易计划的评估发现，人们对于环境公正的关注已有良好基础；另一方面，也发现自实施排污交易以来，弱势社区中[局部污染的现象有所增加](#)。此外，尽管加州有承诺过要在排污交易中达到一定的目标，但仍[无法实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要求](#)。

相较之下，纽约州通过了美国[最具有企图心的气候政策](#)，其成功的原因是建立了以公平条款为中心，有着宽广基础、多议题导向的联盟。《气候领导力和社区保护法》(Climate Leadership and Community Protection Act)并不只是单单关注于减少排放量的问题，而且还优先投资于弱势的社区。整个气候法案还取决于[伴随通过的](#)

[法案](#)：这项法案建立了一个永久的环境正义谘询委员会和也确立了其他条款。正义与气候之间的连结就这样产生了具有企图心且公平的气候政策。

州级单位下的气候工作成果也为低碳转型提供了一系列模型。在这些成果背后的核心精神就是，要同时解决气候和不平等的双重危机。用薪水低落的低品质可再生能源制造业，去取代薪水高、更可能会有工会的化石燃料制造业，虽然是能够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但这并不是一种公正转型。另一方面，过去的能源转型未能兼顾到工人和社区，像是去工业化就使得化石燃料工人更加抵抗其他种的强迫性能源转型。诸如[气候领导工作](#)(Labor Leading on Climate)和[气候工作国家资源中心](#)(Climate Jobs National Resource Center)之类州层级的倡议行动，也有邀请州地方与当地工会一同参与，推动有利于工人与气候的政策。在创造优良工作机会的同时，也与减轻排放量的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可以利用工会的政治力量，所以这些行动非常地有效。从纽约气候工作组织(Climature Jobs New York)的[成功](#)来看确实证明了这一点，其中正承诺要提供15亿美元来创造40,000个气候相关工作。

由于拜登与贺锦丽执政的政权，很可能会出现将公平与正义的条约置之不理的危机，因此州级单位必须努力带头推动公正转型。最后，考虑到从化石燃料过渡到其他能源的程度和范围，解决气候危机需要国家和国际间的共同努力；而气候政策仍不能脱离经济和社会因素去考量减轻排放量的问题。州级单位所付出的努力，正可以给予我们一条指引的道路：如何推进公正转型，并进一步解决气候与不平等、社会不公正三者之间共同的议题。■

来信寄至：

J. Mijin Cha <mcha@oxy.edu>

> 基进补偿方案

Marcus Anthony Hunter, UCLA, 美国

在超过四百年、四千个月、或两百万分钟的岁月中，美利坚合众国始终都没有摆脱奴隶制的罪行。即便许多倡议者和学者宣称在亚伯拉罕·林肯颁布《解放奴隶宣言》后即宣告了奴隶制的死亡，但实际上，奴隶制却似未被治愈的病毒般，以各种形式持续地向四处扩散和感染，证明自己仍然存在。从监狱工业复合体 (prison industrial complex)、塔斯基吉梅毒实验 (the Tuskegee experiment)、到链锁群犯 (chain gangs)，那个宣称已经废除奴隶制度的政府，仍然让黑人的生命停留在脆弱且没有保障的状态之中。

源自于贪婪、种族歧视、强暴欲望和殖民主义的美洲奴隶制及更广泛的欧洲奴隶交易，诋毁、侵犯、羞辱了黑人的人性尊严。数以十万计的黑人从自己在非洲的家乡被带往西非港口，经残酷的中央航道 (Middle Passage) 越过大西洋后，被送往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原住民居住的土地。他们不是死在航运的过程中，就是死在南方的田野里或是北方的地下室；他们大都死的早，但是已经足够将下一代奴隶再生产出来。

黑人被奴役，他们的身体和家庭被夺去、灵魂被日日冒死的生活摧毁、免费劳力被视为理所当然，这些种族歧视历史和反人性且痛苦的事实，是我们所继承的。同时，我们也继承了缴清这些债务的责任，即是所谓的补偿 (reparations)。这些经年累月且不曾停止的反人性罪、创伤、债务直到现在仍然没有被偿付或调解，在这个过渡时期，黑人不得不臣服于深深地镶嵌在国家中的反黑人基因的监视之下，并系统性地被放任自生自灭。

将近五百年后，精确地计算并且偿付对黑人造成的伤害已经变得不再可能。谁能获得补偿？怎么获得补偿？为何得以获得补偿？在奴隶主都已经

死去许久的现在，我们又要找谁负责？这些关于补偿的疑问构成了自1865年以来的争论，却也让修补的尝试成为可能。

近年来，跨政治立场的政府都为补偿做出了令人信服的案例，但是无论是保守派或者进步派的倡议者，都在绝大部分的案例中误把补偿等同于金钱赔偿。金钱赔偿或经济上的赔偿有其重要性，但这不代表修复的全部。更甚者，这些对金钱持续且反复地强调容易让人以为奴隶制所带来的死亡与苦难可以被空白支票上的数字所代表，而这些数字的决定权掌握在政策制定者、研究者和诉讼律师的手中。但是，人们的灵魂跟生命是有固定市场价格、或是可以被金融货币估价的吗？一旦被支付后所有当事人就都解套了吗？人命的价值是可以仅仅被金钱所衡量的吗？这些问题的解答有赖坚定的信念——即黑人的命不仅是有价值的、而且是超越价钱的。因此，我们必须根本地重新审视补偿的意义，认清那些真正的损失和亏欠不能轻易被以货币化了事。

若想要将美国转化成为一个更自由、更安全、更正义的社会，我们就必须试图面对和治愈过往未被明确识别的、集体的种族历史以及创伤。那里有成堆的债务等着我们去与之和解、有被侵害的过去等着我们去免除和平反、有悬而未决的种族平等和公平问题等着我们去修补。上述遗绪对应到七种补偿面向，是前所未有的、也是欲通往全面的治愈和重建所不可或缺的：

- 政治补偿：修复性地、且带有历史意识地转变政府中的政治代表性。
- 知性补偿：对遭受奴役的人们及其后代的创造、发明以及想法给予特别及公开的肯认。
- 合法性补偿：在法律和政策中建立修复式正义及种族公平性的合法性。

>>

「如果我们要把美国转变成一个更自由、更安全、更公正的社会，我们就必须正视和治愈我们混乱的、集体的种族历史和创伤。」

- 经济补偿：金钱或货币的协助、补贴、返还、以及债务减免。
- 社会补偿：修复社会契约以终结种族主义和种族阶层意识，确立人性尊严。
- 空间补偿：社经和政治机会的地域性修复，特别是那些因奴隶制而流离失所或是被剥夺权利的人们及其后代。
- 精神补偿：对那些在奴隶交易网路和美国奴隶制下丧失其宗教和精神信仰、实践机会以及信念的人们给予特别的承认及代表性并使之复原。

这七种形式的补偿，将是美国及其海外不可或缺的追求，为了结束种族不平等，以及治愈那些由奴隶制、奴隶贸易、奠基在奴隶上的全球贸易和受上述历史所公认、流传的被改变、扭曲的文化观念所带来的罪过和后续影响。黑人并没有自愿为奴，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类应该在如此没有人性的残酷体制下生活。相反地，黑人和与他们同样处境的美洲原住民有资格从那些辜负他们、并从他们身上榨取几世纪金钱的全球、联邦、区域和地方政府机构索取某种形式的救济、修复、还有赔偿。

欲达成这些要紧的转变，真相、种族的愈合、以及转型缺一不可。这种取径与由 Queen Mother Audley Moore 和前众议员 John Conyers 发起且被现任众议员 Sheila Jackson-Lee 继承推动的 H.R.40（研究和制定非裔美国人赔偿建议委员会法案）在要求补偿非裔美国人的呼吁上是一致且互补的。在众议员 Barbara Lee 和参议员 Cory Booker 的领导之下，目前也有建立国家级 TRHT（真相、种族愈

合和转型）委员会的呼声，是我设想中一个永续的国家、地方、区域级 ARCH（种族及文化愈合档案室）的第一步。

美国必须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去追求种族的平等和愈合，以转型成一个不再区分人种阶级的社会。在拜登—哈里斯的执政下，如果这项计划在行政和法律层面都被认真对待和执行，美国就能在世界的舞台上成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转型案例，展现透过承认和纪录真相以及追求有意义的种族愈合，的确可以脱胎换骨成一个所有人都被公平地对待、都被给予有意义的参与权、且拥有第一等公民权的国家，避免和减轻了未来可能的伤害。如果我们能有意识地、急切且团结一致地建立专门的公私基金、国家和地方级 ARCH、TRHT 委员会、以及可实行且有针对性的补偿政策，就可以确保那些非人道欧洲奴隶交易的遗产将会终结，而我们将会踏上全新的旅程。真相，是种族愈合转型、以及未来繁荣的关键。■

來信寄至：

Marcus Anthony Hunter <hunter@soc.ucla.edu>

> 在欧华人处境的变迁

Fanni Bec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奥地利, 以及 Pál Nyíri, Vrije Universiteit Amsterdam, 荷兰

在 1998年, 一本主题为欧洲华人的论文集指出连续几波华人移民到欧洲的浪潮: 有二十世纪初的浙江省小商人、二十世纪中叶来自香港和周边区域的殖民移民、越战后去殖民化风潮中的东南亚后殖民移民、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商人及劳力移民。这些移民潮造就了独特的社会语言团体, 团体间极少交流, 但有着广泛的跨境联系。这些团体在二十世纪末的社经地位普遍来说仍是相对低的, 但却在不同的区域展现出异质性。在西北欧, 他们大多从事餐饮业; 在南欧, 他们会出现在小型的成衣工作室; 在东欧, 他们则在市场和小店面进口并贩卖消费品。

来到新世纪, 在欧华人的社会人口组成和社经地位经历了根本的转变。首先, 如专刊中庄雅涵、莲娜和陈秀琼所纪录的, 一个在当地出生、不断向上流动的华人世代已经成年。这个世代的华人对于歧视更加敏感、且更接受自由派的反种族主义论述, 但他们同时对于欧洲经济成长趋缓感到失望, 而此时中国的各种机会在向他们招手, 这促使了这一个世代的年轻人移民回中国、或过着跨国的生活。尽管过去曾将移居欧洲视为实现社会流动的捷径, 但如今这些移动的方向更加复杂。

从中国到欧洲新一代移民的样貌反应出全球政治经济的剧烈变化: 华人经营的餐厅和商店中的职位渐渐被其他移民团体接管, 且华人的主体不再是小商人或体力劳动者(即便一种新型态的、由国家主导的、常见于在东南欧的中资基础建设项目的劳力移民正在兴起中), 而是如同

Thøgersen 以及 Beck、Knyihár 和 Szabó 所纪录的, 被学生、随着中共资本向海外扩张的外籍经理人、以及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移民取而代之。因此, 欧洲华人早先的社会语言划分开始变得复杂, 且逐渐被阶级分层所复盖。

华人在欧洲社会中的地位出现改变并非仅源自于所谓的第二、第三代移民的「融入」和提出的政治要求, 以及新一代移民较高的社经地位, 也与地缘政治的变化脱不了关系。中国是一个让人又羡慕又害怕的存在, 随着欧盟跟中国的关系日益敌对, 中国政府想将在欧华人变成政治说客的意图愈来愈明显。虽然这些举动并不新鲜, 但是中国社群媒体在欧洲的出现、以及中国对抗新冠肺炎的成功, 让中国这些政治企图更加地有效且有说服力。如邓婷的著作指出, 其中一个影响即是中国日趋膨胀的国家自信让在欧华人们开始质疑那些让他们被边缘化的种族阶级制。同时, Gledić 以及 Beck、Knyihár 和 Szabó 的著作指出, 那些与中国友好的国家(如塞尔维亚和匈牙利)并没有让自己国内的华人直接受益。

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在欧华人地位的转变。有些华人成为中国口罩外交的工具, 很多人也因为「中国病毒」而遭遇口头或肢体上的暴力对待, 成为原先潜伏已久的歧视、排外情绪、以及持续升高的政治疑虑的宣洩口。当疫情的情况反转, 那些想回中国躲避疫情的华人, 却发现祖国用经济上的障碍、对「受污染者」的歧视、以及不忠不义的标籤阻挡他们回去。但是, 如同 Bofulin 所言, 原先在欧华人的内部再自然不过的跨国移动能力, 却也开始受到其他中国移民的质疑和谴责, 因为他们渴望揪出传播疫情的罪魁祸首。

如今，社群媒体加剧了这种恐慌。如果说1990年代末期中国在欧洲的媒体，仍是由不同政治取向的地方报纸和刚起步的卫星电视所组成，那现在媒体已经变成完全由接受中国政府审查的社群媒体平台(如微信)来主导，成为中国政府观点和民族主义的传声筒，容不下其他意见。该网路领域是**必要的动员工具**，但也与脸书和推特这类平台共存，将它们视为通往欧洲公众舆论的桥樑。当那些在法国出生的华人倡议者受到「黑命贵」这类反种族歧视的运动影响，而尝试用脸书去寻找其他少数族裔的盟友时，义大利的华人企业家却建立起自己版本的种族等级制度，同时匈牙利的中产阶级华人紧跟着再次复兴的「白」欧洲理想，这些理想在当地政府的推波助澜下，**与微信上流行的种族理论不谋而合**。如果前者是透过诉诸反种族主义与反精英主义的团结来抵抗歧视，那么后者就是以种族和阶级秩序之名这样做的，尤以欧亚精英为最。

本次专题的贡献者们¹将其研究立基于跨族群关系形成的实体空间，从寄宿学校到酒吧，以识别和分析在欧华人的印记—不断变化的内外边界和阶级制度。■

來信寄至：

Fanni Beck <Beck_Fanni@phd.ceu.edu>

Pál Nyíri <p.d.nyiri@vu.nl>

1. 本次研讨会的想法源于2020年10月16日中国欧洲研究网路在布达佩斯举办的「[民族间关系:中国移民及其欧洲东道国社会研讨会](#)」，该研讨会得到了COST协会的支持。

> 在法华人： 从沉默到行动

Ya-Han Chuang (莊雅涵), Institut national d'études démographiques (INED), 法国, Emilie Tran (陳秀琼),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以及 Hélène Le Bail, CNRS, CERI-Sciences Po Paris, 法国

在法国出生的亚洲人在巴黎示威，反对反亚洲的种族歧视。
来源: Camille Millerand。



如同在英国和荷兰等其他西欧国家，华人社群在法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之初。早期华人的出现有三个关键因素：殖民、一战期间招募的华人劳工、以及战争期间滞留当地的学生。这种早期流动性对近期的移民浪潮产生了影响：由于1978年后早期的移民网路历经重建，如今浙江省的温州已经成为法国华人移民及其后代主要迁移来源地。此外，法国殖民的遗产之一是东南亚海外华人的出现，他们在1970、1980年代以难民的身份从柬埔寨、越南和寮国入境法国。在世纪之交，法国华裔人口的组成在原籍地、迁徙路线和阶级方面都变得更加多样化。特别是在1990年代，中国北方由于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而遭受大规模裁员的冲击，使得法国成为大量来自中国北方人口的移民目的地。一般来说，入境欧盟的主要合法管道仍然是[学生签证](#)。在法国，[华裔留学生](#)是仅次于摩洛哥裔的第二大外国学生群体(佔9%)。

法国是欧洲华人移民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虽然没有官方的族群统计数据，但据估计约有40万位华裔移民及其后代)；在拥有居留权的外国人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位居[第五大群体](#)。这些华裔移民的多样性不仅体现在教育程度、职业和经济地位上(富裕的投资者、跨国贸易商、专业人士、学生、企业家以及工人)，也体现在世代、流动性还有对法国社会的参与程度上。相对地，他们也共享一些特征，像是来自东南亚与来自中国(主要是温州)的华裔移民在侨民企业圈的合作、以及近期在揭露人身安全问题和日常种族歧视的集体行动。

> 反抗种族歧视的集体行动

在巴黎及其邻近郊区的华人社群常常成为偷窃和小型犯罪的受害者。这不只是因为华人常被认为很富有—他们的生意或庆祝活动(例如奢华的婚宴)都常集中在多族群、社会经济贫

困的地区，也因为在被攻击或抢劫之后较不愿意寻求警方的协助。对于无证移民与小企业家来说，岌岌可危的身份状态和对法国政治的冷漠都使他们长期不愿意参与动员。

然而，在过去十年，随着越来越多对于人身安全的担心与意外的发生，在巴黎的华人社群——曾经被视为沉默、甚至是努力工作又保持低调的模范少数群体，已经组织了五场以上的大规模抗争，要求警察提供更多保护。有时候，这些抗争也会被中国领事馆以「保护海外公民」的名义支持，符合中国政府自2012年起以维护其公民可能受损的利益之名向外投射影响力的方针。这五个集体动员案例在动员方式上有所差异：其中三个是大型街头抗争、一个是企业家联盟转型成的（失败的）压力团体、最后一个为街头暴动与和平集会的混合体。这些行动通常都在强调华人居民和商人在特定社区中所缺乏的安全感，并且提出类似的诉求：增加警察在社区的巡逻、加重对违法者的罚则、以及让华人受害者投诉的管道更加畅通。

2016年，一个华人劳工在巴黎郊区被杀害后，随之而来的那场街头抗争是一个转折点，标志着第二代在法华人挺身而出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在法国出生的华裔重塑了他们的主张：强调在针对华裔或亚裔社群的暴力行为下，存在更深层的结构性种族歧视。华人或亚洲人的社会运动在北美和澳洲都已经被研究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在欧洲却是一个新的研究焦点。在法国的案例当中，我们可以辨认出在法华人的三个主要行动类型，都与刻板印象的再现以及寻求认可有关：(1) 集体记忆的收集和传播(2) 反对针对性暴力的动员(3) 以文化行动主义来解开并修正对于亚洲人刻板印象的再现。

要了解在当地出生的法国华人最近的行动，就必须回到2000年代，当时线上社群网路才开始普及，成为将个人经验转化成集体经验的场域，特别是那些对轻微的冒犯、与隐微的种族羞辱的共同经验。那时，在法华人开始在脸书、以及后来的微信和推特创建论坛跟讨论群组。在这些地方，他们以法文为主要语言（但有时候混杂着中文或是其他亚洲语言）分享自身经验。

在2016年后发展起来的「文化行动主义」也主要以线上工具如短影片、部落格、YouTube频道、网路系列节目和Podcast作为平台，让艺术圈和媒体圈的在法华人有更多机会建立连结。自2016年起，很多人对建构集体认同、以及反对针对亚裔的歧视都有贡献。有些人试图将这些行动跟其他少数族裔的倡议连结起来，例如Grace Ly与著名的非裔女权家Rokhaya Diallo合办的Podcast—Kiffe ta race，或是亚裔法人对黑人命也是命抗争(Black Lives Matter protests)的参与，用以缓和跨族群间的紧张。其他人将族群／种族的议题与性别议题交织在一起，以解构对亚裔女性和男性的性幻想。

2020年，新冠肺炎给了中国一个在国际上做外交宣传的好机会，得以动员海外华人来讲「真实的中国故事」。中国政府是否、或是在什么程度上会利用这波被疫情激发的、以华人为主体的反种族歧视热潮仍是未定之数，但更有趣的是比较在法的第一、第二、第三代华人对祖国跨国动员的反应。■

來信寄至：

Ya-Han Chuang <ya-han.chuang@ined.fr>

Emilie Tran <emilietran@hkbu.edu.hk>

Hélène Le Bail <helene.lebail@sciencespo.fr>

> 中国留学生在欧洲

Stig Thøgersen, Aarhus University, 丹麦



欧洲校园中的中国学生。
来源：创用CC。

1978年，邓小平宣布中国每年要送三千到四千个学生出国，以打破国家的科技孤立状态、加速现代化的进程。当时看起来雄心勃勃的计划跟现在的情况比起来简直小巫见大巫。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在海外高等教育机构注册的中国学生有将近百万，他们的学费是许多大学重要的收入，而且他们本身也是中国国际能见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欧洲国家正在接收这批出走潮中属于自己的那份，英国分到107,000人，为欧洲之首，仅次于美国和澳大利亚。考量到英文是中国教育中最重要外语，这也没有特别令人惊讶。其他欧盟国家里排名较高的大学也收到不少学生，像是德国有超过30,000人、法国将近24,000人、以及意大利超过15,000人。就连小型的欧盟国家例如瑞典、爱尔兰、匈牙利和瑞士也都有差不多2,000位中国学生。欧陆国家的奖学金、较美国和英国低廉的学费、申根签证可以走访多个国家的便利性都是吸引学生去非英语系国家的因素。很多人也被欧洲的文化、尤其是法国跟意大利的浪漫氛围和生活方式所吸引。

> 近几十年来学生样貌的变化

很多事情已经与1978年毛泽东时代刚结束时不一样了。第一，当初留学生被国家小心翼翼地控制，并且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但是如今出国的原因已经回归到个人和家庭的野心，[自费学生的比重甚至高达90%](#)。这个现象将国际教育领域形塑成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市场，有很多因素影响学生的目的地的选择：[大学的排名和声望](#)、学费和生活费的负担、收到留学国补助的机率、想像中的社会安全程度、留学国的名声等，这些因素都在这个复杂的游戏里佔有一席之地。其中，[中国私人教育代理机构](#)已经嗅到了商机，不仅指引协助学生还有他们的家人做出棘手的决定，还帮他们处理复杂的注册和签证手续。

第二，出国留学已经不再是中国学生的首选。回头去看西元两千年的时候，大部分的中国学生把取得[已开发国家的弹性公民权](#)当作最高目标，但现在可以进入中国自己排名前面的学校反而更有吸引力。除非真的是名牌大学，不然外国学历的社会声望下降得很迅速，中国媒体也大

量报导那些所谓的「文凭工厂」还有低品质的学程。虽然如此，在国家级的入学考试一人见人怕的高考一的控制之下，中国高等教育系统是非常阶层化的。所以，与其去一个二三流的大学拿一个没什么就业前景的学历，很多中产阶级学生及家庭宁愿去国外寻找就学会。

第三，过去学生把出国留学当作移民的起始点，但是现在的学生却把留学当作回国内就业的跳板。在1980年代，特别是在1989年六月对民主运动的镇压之后，只有极少数有国外学历的中国人会想要回去。但是在21世纪，上述的情况有很大的改变，原因在于欧洲就业市场萎缩、中国就业机会及薪水提高、再加上[一系列鼓励回国就业的国家政策](#)的推波助澜。虽然现在中国政府不再钜细靡遗地规定谁该去哪里留学，但是他们仍然需要一些人才回流来促进国家发展。最后，中国的教育移民比以前年轻的多。大学生比研究生多，甚至很多家庭为了让他们的孩子能够进国外的大学，在高中就把他们送出去好，让他们在文化上跟学术上都做好准备。

大部分早期有关中国留学生的研究都聚焦在西方老师对他们的抱怨上，像是在[教室里太安静、躲在同温层的小圈圈里面、还有对教育的工具性态度](#)。这些问题还在，但是近期的研究以更宽广的视角来看待这些留学生的经验。相对于逐渐个体化的中国社会，留学生倾向将他们的留学经验看作是「[自我认同改变与转化的情感旅程](#)」，扩展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在专业与成为当代世界公民的面向上更具竞争力，是个人迈向成熟、改变一生的经验。与他们的西方同侪相同，年轻的中国留学生[把更广泛的旅行结合进他们的学](#)

[习过程中](#)，以融入异文化并且测试自己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脉络下的生存和成长能力。这也意味着，虽然仍有许多学生选择所谓的「硬」科学和商业研究，但我们也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完全认知到他们可能无法在中国或欧洲就业市场中找到一个安稳的工作的前提之下，仍然选择进入更「软」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

众多的留学生已经改变了在欧华人口口的组成，但我们却对他们如何跟华人社群互动所知甚少。一个[法国研究](#)指出，虽然中国学生间已经可以建立强连结，但是与既有的华人社群的互动是非常有限的。另一个[英国研究](#)却发现这些互动在增加当中，而且中国大学生对华人离散社群的进一步发展是相当重要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中国留学生的数量是持续增加的，但是两个近期的趋势却让未来更难以预测。其一是2020的疫情暂时封锁了大部分的教育交流，而且很有可能延续到2021，尤其是中国人把欧洲视为疫情的热点。再来，西方跟中国的关系愈来愈紧张，[导致中国的形象在欧洲变差](#)，中国留学生也就成为潜在风险。在这个层面上，国际政治可能会影响未来欧洲与中国之间教育移民。■

來信寄至：

Stig Thøgersen <stig.thogersen@cas.au.dk>

> 布达佩斯的「黄金签证」 中国移民

Fanni Bec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匈牙利, Eszter Knyihár, Eötvös Lorand University, 匈牙利, 以及 Linda Szabó, Periféria Policy and Research Center, 匈牙利

随着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中的位置变化、以及其社会结构的重组,越来越多的都市中上阶级家庭正移居到全球某些少数的国家。调查显示,这些**有钱人的出走**动机已经超越了物质主义、不再以财富积累为目标,他们形成了一个「黄金签证」的市场,让一些国家得以用**贩卖居住权和公民权**来吸引国外投资。近年来,许多领取黄金签证的中国人开始偏好移民中东欧国家,因为那边的政府会用更便宜的移民方案来欢迎他们。

> 匈牙利的「黄金签证」方案

匈牙利的「黄金签证」方案是这个新兴市场中最受欢迎的方案之一:当这个方案在2013至2017年实施时,不仅是整个欧盟中第二便宜的、申请手续的便利度和速度也都超越其他对手。在这个方案中,除了必须花250,000欧元(后来变成300,000欧元)购买五年期的国家债券再加上佣金之外,没有其他的要求。因此,超过一万九千位申请者(其中81%为中国人)获得了居留权的许可。虽然这个方案是特别为了「移民不移住」者所设计的,但似乎没有吸引到那些不是要真正的移民、只是想在欧盟中获得移动便利性的商务人士,反而吸引到那些抓住机会移居国外的家庭。他们把投资当作工具来完成非经济性的目标:寻找一个孩子能健全成长的环境。

在匈牙利领取黄金签证的中国移民是来自中国大都市(特别是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一线城市)的中产阶级家庭,他们依靠的是来自中国的收入或汇款,与**1990年代早期**移居匈牙利、来自中国东南省份的小商人不同,他们并不以经济或财富的积累为目标,而是追求在一个拥有绿色环境、文化饱满、且以白种人为主的城市中,享有休



推广匈牙利的「黄金签证」项目。

来源:<http://immigration-hungary.com/EN/>。

閒的生活方式。简而言之,就是追求在一个正统的「**欧洲想像**」中生活—虽然是用打折过后的价格。

这些家庭决定离开中国、选择匈牙利的原因,是来自于中国改革时期的一胎化政策对他们带来的历史、社会与政治性影响。当中国政府在1970年代末期引进家庭计划的时候,其中一个**合理化的说法**就是减少人口的数量会让提升其素质。于是这变成中国中产阶级父母的**某种坚持**:尽最大的可能去培养子女的「**素质**」。根据官方的论述,一个人在身体上、品行上、以及教育上的素质不止取决于个人的努力,也与环境的影响有关,但是中国的都市并没有办法满足这些家长对环境的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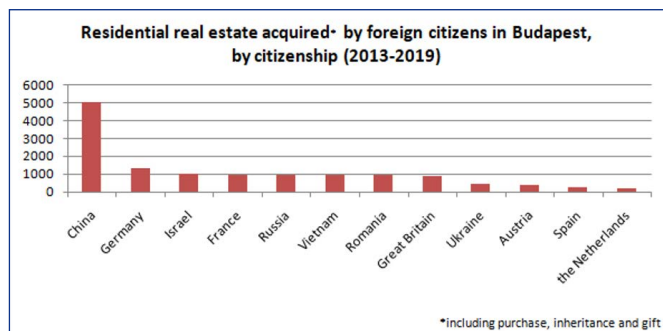
> 打折后的欧洲家园

有鑑于此,匈牙利是中国中产家庭的理想目的地,有着物质、社会、及教育上令人满意的环境,以及负担得起的生活开销。对许多中国黄金

「自匈牙利黄金签证项目推出以来,截至去年,外国人在布达佩斯购买房产的数量大幅增加。」

签证移民而言,目标是找到一个位置好且合适的房子,除了当作投资以外,也是一个「家」。一个理想的「家」的概念,与想要定下来、安顿下来的感受脱不了关系,也连结到房屋所有权。拥有一个可继承房屋的可能性,让中国移民有机会在匈牙利(大部分在首都布达佩斯),以更低的固定资本支出、过着比中国的大城市或是任何现代资本主义下的枢纽城市更高品质的生活。

自从匈牙利的黄金签证方案实施后,布达佩斯房地产被外国人收购的案件大幅增加(直到疫情之前),即使房地产市场普遍繁荣,中国人还是外国个人投资者的最大宗群体。



在中国移民者中,不只拿黄金签证的人会被布达佩斯的房产吸引,相当数量的小商人也转向房产投资。我们的研究指出,虽然布达佩斯的市中心受到双方的欢迎,但是小商人更倾向购买在中国批发和零售市场旁边、或是比较可以负担的起的东侧郊区;反之,黄金签证移民则对新的住

宅区、拥有丘陵且绿意盎然的西区、以及都会区的独立式住宅更感兴趣。

虽然一部分的黄金签证移民试图购买可以当作投资标的又可以定居的房产,但是当他们在选择一个「家」的时候,还是会寻找在好学区、好社区内的公寓。「素质」的抽象概念反应在空间上,评估的标准是社区及学校的种族(在这边指的是罗姆人或是移民的小孩)和阶级构成,体现了一种选择性的世界主义。许多刚到匈牙利的中国人虽然被西方的生活方式吸引、但对穆斯林和黑人存在感到不自在,因此倾向支持政府的反移民右翼民粹主义—即便他们本身也是移民。许多中国的新来者强调匈牙利比西欧其他国家更欢迎他们、且几乎感觉不到任何歧视,但讽刺的是,也是这群人在讚叹政府的严格移民政策—接收更少的难民、穆斯林和非裔移民—好让他们拥有更多安全感。

匈牙利居住权或是公民权的给予,被政府透过黄金签证方案、或是国家间外交的特殊管道,策略性地作为政策工具,以取得西欧以外的经济资源。这些行为不但巩固了统治精英的经济利益,也提高了国家对欧盟的经济和政治筹码。作为跨大西洋权力集团外崛起大国的公民,中国黄金签证移民可能成为这个过程的受益者;讽刺的是,他们可以在这些充满争议的政经形势之下,在布达佩斯得到「家」的感觉、并且在欧洲获得归属感。■

來信寄至:

Fanni Beck <beck_fanni@phd.ceu.edu>

Eszter Knyihár <nyihar.eszter0302@gmail.com>

Linda Szabó <szabo.linda@periferiakozpont.hu>

> 义大利华人： 商业与认同

Ting Deng (鄧婷), 布朗大学人口研究与培训中心, Brown University, 美国



米兰唐人街的一个邮箱上有中国的小床租赁广告。
来源: Ting Deng

袁先生于1988年出生于波隆那(Bologna), 是第三代华人。他的家人于1930年代起陆续抵达义大利。第一个踏足义大利的是袁先生祖父的哥哥。他与其他几个单身的同乡一起到义大利, 想在海外做生意碰碰运气。尽管法西斯政权阻挡异族通婚, 他还是像当时的许多华人一样娶了乡下来的义大利女人。袁先生的叔公没有像大多数华人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回国, 而是留在自己的手工作坊里与他的义大利妻子一起制作皮包。他们生了几个孩子, 但据袁先生所说, 这些孩子与后来移民义大利的亲戚已经断了联系。1950年代, 袁先生的祖父离开家乡, 离开仍留守在中国东南沿海温州地区一个小村落里的妻儿。他前往义大利, 在他哥哥家的皮革厂做工。1978年, 袁先生的父亲和兄弟姊妹前往义大利与祖父团聚。袁先生的父亲后来开了一家中餐馆, 他的母亲和姐姐随后也移民过去, 一起打理餐馆。这家中餐馆位于波隆纳华人人口最稠密的社区。袁先生父亲的兄弟姐妹也都各自开了工厂或餐馆。袁家人的故事是一个经典的链式移民的案例。亲戚们一个个地都移民到了义大利, 先在自家人的事业里工作, 再自行创业。

这些早期的温州移民可能没有一个人会预料到, 从他们开始的链式移民最终将带动成千上万的中国非技术劳工来到义大利和欧洲其他地方。自中国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以来, 这些中国移民渴望在[欧洲迅速致富](#)。从1980年代中期到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期间, [中国输出的移民顺应了义大利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义大利劳动力市场需要廉价灵活的跨国劳动力服务于全球快时尚行业中新兴的义大利制造品牌。

制造业手工作坊和中餐馆是义大利华人移民的两种主要的致富产业。当中国成为全球商品生产国和出口国时，进出口贸易和相关批发业务，就成为自1990年代以来华人移民追求经济成功的一条新途径。2000年以来，前往义大利的大规模中国移民已经逐渐消退，而在义华人移民的触角伸向小型零售和服务业。越来越多的华人转而投入针对在地多元人口的小型邻里企业，包括咖啡馆、百货店和理发店。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华人移民参与跨国生意。一些人去中国投资，而另一些人则加入了蓬勃发展的微商行业，利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信，做起了中义两国华人消费者的生意。

义大利华人内部也日益凸显出世代间的差异性。在义大利出生或至少在义大利长大的华人不再像老一辈一样满足于依赖廉价劳动力的族群经济。越来越多的华裔接受了高等教育，并致力于进入主流劳动力市场。然而，华人的身份和原本的族群资源仍然是年轻一代华裔赖以生存的重要社会和文化资本。一些当上律师、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员的华裔，主要还是服务于华人社区；一些人则进入在义大利有跨国业务的中国国企和私企；还有一些人回到中国为义大利公司或其他跨国公司工作。讽刺的是，袁先生和他那代华裔在不认为中文重要的环境中长大，却在成年后开始学习中文。现在，袁先生那个世代的年轻父母认为中文对他们的孩子来说是必须掌握的技能。

对于义大利华人而言，中国不再只是一个他们欠缺实际生活经验的想象中的远方。中国作为一个不断壮大的经济强国，在塑造义大利华人的族群经济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华人的身份本身就是一种族群资本(ethnic capital)。他们希望从中受益，以便在不稳定的经济现状和未来中生存。但是，中国不仅仅是义大利华人获取资源的来源。对于他们来说，中国也变成他们评价义大利的参照点。与中国的经济成功相比，许多人对义大利的经济停滞感到不满，并对日益多元文化的欧洲感到幻灭。许多人批评他们遭遇的日常歧视，但往往也内化许多主流刻板印象，并以此评判其他移民，以及那些在他们经营商店或酒吧时遇到的义大利人。他们常常认为义大利人都很懒散，且没有华人勤奋。在羡慕义大利人热爱休闲、享受生活的时候，许多华人也相信正是这种特质导致了义大利的经济困境。

在包括香港反送中运动、新疆、还有新冠肺炎疫情等一连串和中国有关的争议事件中，许多义大利华人在西方媒体的漫天指责中迅速站到了中国政府一边。中国做为崛起中的政治经济强国不仅重新描绘了义大利华族群经济的样貌，也催生了一种离散国族主义，重新形塑了义大利华人的族群意识。就这点来看，袁先生祖父一代离开的那个中国和当时落地生根的那个义大利似乎都早已面目全非了。■

來信寄至：

Ting Deng <ting_deng@brown.edu>

> 塞尔维亚华人的身份变化

Jelena Gledić, University of Belgrade, 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首都的一家餐馆试图吸引中国游客。来源：Jelena Gledić。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与塞尔维亚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为移民社群带来改变。塞尔维亚华人从原本在经济危机时期做为必要、但不受欢迎的局外人，转为既被视为发展机会、又是潜在威胁的复杂群体。

> 第一波移民

1990年代，匈牙利签证政策的不利变化之后，第一批较大规模的中国移民南迁到塞尔维亚定居。他们大多是来自中国南方省份的商人，从事跨国业务、生活在相对独立的社区。他们继续在贝尔格勒德（而非布达佩斯）地区从事批货贸易。这些企业家似乎以转型经济为目标，希望以此从特定商品稀缺中获利。他们的存在，可被视

为中国东欧迁徙历史的延续，也是中国全球地位变迁的结果。我们也能透过塞尔维亚在欧洲的地位来理解此现象——作为中国商人的理想贸易地点，塞尔维亚虽然有着比欧盟宽松的管制，但是愿意在此永久居留的移民并不多。多数小孩仍然被送到中国读书，当地的华裔出生人口也因此较少。随着塞尔维亚加入欧盟的近程减缓，许多中资企业转移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义大利、克罗埃西亚和其他欧盟国家，甚至是南美和非洲。

有些研究曾以塞尔维亚人中的第一批华人社群之地位为主题。人们对这些中国移民的印象大多是负面的，并认为他们出售的商品品质低落；不过塞尔维亚人也感谢他们提供各式各样的商品，尤其这些商品在1990年代的经济制裁期

间供不应求。由于中国移民和扰人的历史动荡时期之间有所连结，加强了他们不利的地位。

> 新的移民与移动

2009年中国和塞尔维亚建立策略夥伴关系之后，两国的合作迅速发展。在一带一路的政策下，中国在塞尔维亚的建筑和投资有了大幅度增长，也加强两国在文化和科技领域的合作。最近由中国医生组成的团队更带领塞尔维亚以中国模式对抗COVID-19疫情。但是，这些变化并没有特别影响居住在塞尔维亚的华裔移民的地位，因为塞尔维亚人并不认为这些企业家和中国可以划上等号。此外，新的移民和流动让塞尔维亚来了新一波中国移民，他们反而在塞尔维亚成为中国形象的代言人。

中国的投资掀起了新一波移民潮，包括劳动者和中高阶管理人员在内的限期移民。尽管这些建设获得许多宣传，但这些新的华人社群却生活在大众视线之外，大多居住在偏远建筑工地附近。这是第一次有这么多数量的中国建筑工根据州际协议移民到欧洲国家，这显示出欧洲的中国劳工有很大的转变，其过去通常为非法或地下的餐饮业或服饰业。

在2017年建立了双边免签后，塞尔维亚的第二波中国移民潮是基于流动而不是移民，造成大量中国游客湧入，据报导，这些游客属于中国中上层阶级，由于人数众多，塞尔维亚和中国警察甚至联合组成了警察巡逻点。塞尔维亚与塞浦路斯、其他西巴尔干国家一起，在2019年成为中国游客人数增长最快的欧洲国家之一。旅游业的增长与东欧其他地区的趋势很类似。然而，这波旅游潮并未伴随像在匈牙利或葡萄牙等国一样有着因追求生活风格而来中产阶级移民，这可能是因为塞尔维亚并不属于欧盟。

> 朝向一个共同的未来

针对上述最新的发展，目前仍没有广泛的研究。尽管如此，媒体和八卦轶闻则透露了塞尔维亚人对这两个新群体的反应不同。一方面，后者是受欢迎的——具有商业头脑的人看到了越来越多相对富裕的中国人到来是一个机会，

试图调整或建立可以满足其特定需求的服务，并在这方面或多或少获得了成功。在塞尔维亚的每个主要旅游点，我们都可以发现这点为该国内带来潜在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在塞尔维亚高失业率的背景下，那些在中国投资计划下工作的人被视为是潜在的威胁。然而，也有出现跨族群的友谊、以及当地社群与中国工人之间紧密连结的零星故事。这种新型中国移民与在地社群的关系可能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发展，未来将可以进一步密切观察。

至于在二十一世纪初就在塞尔维亚生活的中国人，他们的情况并没有受到上述地缘政治和双边关系变化的影响，但他们有着新的机会。一些人认为这两个新群体的到来是扩展事业的机会，可以向工地提供中餐和商品，或是在旅游景点附近开设中餐馆和珍珠奶茶店。有些人利用自己作为「在地人」的身份，向企业提供如何实施计划的建议，或向代办建议如何规划行程。与这些新移民相比，第一波移民的中国人最初可能属于较低的社会经济阶层—不可否认，他们来自于经济尚未起飞的中国。但今天他们可以运用自己的在地知识和经验，成为新一波中国移民向望的对象。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也可以向塞尔维亚人提供跨文化的见解，这样一来，在当地居民眼中，他们的地位也许可能有所改变。

这些不同的华裔移民群体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他们与在地社区的关系反映了全球政治经济变化的轨迹。受到民粹主义和公共卫生等多变因素的强烈影响下，新的移民挑战了既有的边界和阶层，重塑了不同群体间的关系和地位。考量到在塞尔维亚对于中国人有着多元的看法、以及对于两国之间关系的认识有所改变，这些都将促使移民的地位可能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也为未来的移民奠定了基础。■

來信寄至：

Jelena Gledić <jelenagledic@gmail.com>

> 华裔移民與 COVID-19大流行

Martina Bofulin, 科学艺术学院研究中心(ZRC SAZU), 斯洛维尼亚



| 奥地利维也纳的涂鸦。2020年3月。Sebastjan Jemec 摄。

> COVID-19大流行与种族主义

在 2020年初爆发SARS-CoV-2后不久，与对中国人的偏见、种族主义和暴力行为有关的报导数量，在全球急遽增加¹。在一般民众及政府官员对中国人产生的恐惧和种族主义的影响之下，中国人可能在路上受到责骂甚至袭击，就连他们的商店和餐馆都遭到破坏。

受这些攻击影响最大的，是居住在欧洲的中国小企业家，他们的合法居留权通常取决于其经济活动；而他们也仅仅因为中国人的身份，生意就马上蒙受损失。这类小企业家大多是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的「出国热」期间离开中国的；他们有些来自浙江或福建省，也有些来

自中国的城市和东北地区。数十年来，他们已经很好的融入到定居国家中，通常经营蓬勃发展的批发进口公司（主要在东欧和中欧）、小型服装企业（在义大利和西班牙）以及中餐馆。虽然他们在个人的社交、或是与政府机构的互动中受到言语辱骂，并被投以偏见，但他们大多感到安全，且已经习惯于这类歧视。他们也因此常被称为「看不见的少数民族」(invisible minority)，甚少出现在欧洲种族主义的相关讨论中。

在病毒传播到欧洲后的数周内，华裔小企业家的营业额和餐馆顾客数量立即下降，更有些商店遭到破坏（如义大利）。搭公车或看医生（德国、义大利和斯洛维尼亚）时，人们会和他们保持很远的距离；他们甚至因为戴口罩被嘲讽和殴打（在义大利、荷兰和英国），甚至被指控蓄

>>

意囤积口罩以获取暴利，但他们只是为了保护自己(斯洛维尼亚)。不仅是华裔居民，所有具有亚洲面孔的人，无论他们最近去过亚洲旅游，还是从没去过亚洲，都会被这样对待。

> 反抗行动

这些可怕的排挤行为在许多国家都受到抵制。例如在意大利，幼时即从浙江移居至此的 Massimiliano Martigli Jiang 在社群媒体上发起抗议活动，他在佛罗伦斯的主要旅游景点前举着自己的照片，上面写着：「我不是病毒，我是人。放下你的偏见。」在瑞典，韩裔瑞典艺术家 Lisa Wool-Rim Sjöblom 划了一幅大流行期间亚洲人受到排挤的漫画；意大利艺术家 Laika 则以街头艺术的方式，描绘流行病与种族主义对罗马的亚洲人造成影响。至此，COVID-19带来的种族主义，促进了有关系统／人际种族主义的讨论，也促成了欧洲有色人种与亚洲新移民的抗议行动。

> 双边排斥

虽然海外华裔移民受到种族歧视的现象，在许多媒体以及维基百科中已经有充分的记载，然而关于他们返回中国后遭受的排斥，却较少被提及。中国政府在2020年3月宣布无本土疫情后，便开始密切关注境外移入病例。他们迅速采取了各种措施来遏制传播，而中国大使馆、海外华侨组织和移民代表则呼吁移民不要返回中国。旅外侨民的回流对于中国遏制病毒的措施带来负面影响，也威胁到中国政府抗疫成功的论述。

由政府所发起的境外移入威胁论述，在社群媒体上逐渐扩散；许多网民在网路上叫回国的移民「从哪儿来哪儿去」，谴责他们像巨婴²一样，「建设家乡你不行，千里投毒第一名」。最终，国家主流媒体决定将论述导向强调海外华侨的贡献，并抑制网路上的仇恨言论。由这些针对海外侨民

的言论，可以观察到他们在中国国家论述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所变化。过去四十年来，这些人曾被视为让祖国现代化程度增加的爱国者，如今此一地位似乎已不再存在。

面临原生地和居住地人民的排斥后，许多人还受到来自其所属群体(亲戚、朋友和同胞)的污名化。在来自中国传统侨乡的小型企业中，尤其是在浙江省的青田县，污名化尤其明显。这些移民和他们的亲戚、朋友之间有着紧密的社会网路，而这使得他们与世界各地以及自己的家乡——中国东部山区都有所连结。

华侨媒体详细报导了一起案例，指出欧洲第一批华人新冠肺炎患者的家属不仅受到了恶毒谣言的攻击，还受到了来自同胞的威胁。他们的家庭成员认为，自己已经尽其所能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并遏制病毒的传播，却仍然被指控危及其他移民的生命和生意。这一消息不仅在华侨社群中广泛传播，而且还立即传播到了他的原生地，使他在青田的家庭留下污名。

由此可见，这次的COVID大流行，显示排斥和偏见仍是华侨很可能面临的经历，从侨居国到移民过程中随处可见。此外，还有一种新的歧视是针对在中国的华侨。大体来说，这也凸显了将移民者和病毒连结的想像，这种想像将移动本身的概念，区分为受欢迎的和不受欢迎的。■

來信寄至：

Martina Bofulin <martina.bofulin@zrc-sazu.si>

1.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global-europe/news/covid-19-crisis-triggers-eu-racism-against-asians-rights-agency-says>
2. 「巨婴」一词出自心理学家吴志宏的《巨婴之国》一书，他在书中批评了中国年轻人的个人发展。这个词在网上经常用来形容要求苛刻、傲慢的人。

> 极右政权的比较分析

Walden Bello,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inghamton, 美国

COVID-19 的大流行引起了一波思想热潮，人们开始讨论：如何从左派的思想出发，以更进步的路线重组社会？在遍及全球的线上研讨会中，我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方案，包含复兴的左翼凯恩斯主义、去增长、去全球化、生态女性主义、粮食主权、解放的马克思主义，以及「美好生活(Buen Vivir)」的概念。

唯一的问题在于，这些看似美好的想法在政治上难以被广泛接受，即便是目前的主流典范——民主新自由主义经济，也面临了更深层的危机，甚至如同 Dani Rodrik 描述的那样，正逐渐走向消亡。

在政治光谱的另一头，不管是保守派或是极右派，都没有发展出什么创新的想法；就算有一些像是去全球化这种新奇思想，也是从左派偷来的。如今，极右派的声势壮大，而 COVID-19 带来的变动，更可能加强这股势力。

前半个世纪中最令人惊讶的两个事件，其中之一是极右势力在全球崛起，另一个则是二十世纪末十年，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的崩溃。

2010年时，除匈牙利以外，全世界没有任何可以被称为「新极右派」的政权。如今，极右翼人士已经在七个最大的民主国家中掌握了四个政权，包括印度、美国、巴西和菲律宾。虽然这些

政权并未结盟，其国家的选举结果却时常有重大的影响力，促使政治倾向朝右派移转。德国、丹麦和意大利等国便是很好的例子。

右派政权已在全球南方与北方逐渐掌握权力。这些统治集团当然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却也因其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不同位置，而有着各自的特殊性。为了方便分析，我们应将这些政权分开来讨论，并注意到影响这些政权起源和变动的因素，不是只有全球政治经济的位置而已。

> 全球北方的极右派

极右政权崛起的背后有哪些原因，其政权特性又何以构成？

首先，新自由主义政策对人们的生活条件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而欧洲和美国的极右势力懂得利用这点。社会民主党或那些中间偏左的势力，参与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这导致很多选民不再信任社会民主党，认为社民党无法给予自身相应的保障措施，也因此而更容易受到右派势力的利诱。右派很聪明地抛弃了中间偏右人士对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全盘支持，并投机地选择以左派拥护的「福利主义」为主要立场。

其次，在欧洲的极右势力，则利用民主制度的争议，来激起民众对欧盟的不满；他们声称欧

「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极右翼都没有任何真正创新的想法，他们有的有趣的想法，比如去全球化，都是从左翼剽窃来的。然而，极右翼拥有政治势头。」

盟的技术官僚领导阶层并非经由选举产生，其势力却凌驾于经过民选的成员国领导者之上。因此，当「三驾车」在2015年时罔顾公投结果，强迫对希腊实行紧缩计划时，法国国民阵线领导人 Marine Le Pen 便以民主党人的身份声明：「我们只有两个选择：不是民主，就是欧洲独裁。」

第三，极右政党一直以来都在移民议题上有着主导地位，几乎所有人都支持他们的观点。他们不仅指责中间右派和中间左派在移民问题上没有可行的政策，还提出了一种阴谋论，认为中间右派、中间左派与欧盟，已经与所谓的「移民大军」串通，正打算颠覆欧美社会。

反对移民，以及确保白人社会能统治少数族群，是极右派推广与动员的核心价值；其以种族主义作为整体架构，并投机地将自身的立场定位于反全球化、反新自由主义、亲民主之中。举法国 Marine Le Pen 领导的国民阵线为例，他们在几十年前还反对各种形式的累进税制，如今却正呼吁要恢复财富税。正如经济学家 Thomas Piketty 所述，这是该党「社会转向」的过程之一，借由对富者增税，以表态政党对工人社会保护体系的支持。在匈牙利，Viktor Orbán 领导的青民盟也扩张了家庭福利，并为失业者创造了补贴就业机会。极右派领导人认为，只要受益者是拥有「正确」肤色、文化和血统的人，设立特定的措施以保障社会福利、就业机会与经济处境都是好的。当然极右派可能没有明确地这样表示，但他们的确呈现出这样的观点。至少到目前为止，这样的立场在选举与政治上，都是很有效的。

> 全球南方的极右派

接下来是南半球的情况。与北半球相同的是，新自由主义的结构变化，使得民主国家中多数公民的生存环境，变得比原本还要更

糟；在菲律宾、印度和巴西等地的问题更为深远——人们从根本上排斥自由民主。菲律宾的 Rodrigo Duterte、印度的 Narendra Modi 和巴西的 Jair Bolsonaro 等人的政权，正反映出这样的风潮：Duterte 在数千人的现场主持法外处决，并骄傲地声称自己违反了正当程序，Modi 则为印度正日渐衰落的世俗化和多样化处境而自豪，Bolsonaro 则率领人们重返曾经统治巴西20年的军事独裁政治。

在这三个社会中，公民和自由民主间的疏离，主要来自于自由民主承诺与现实的巨大鸿沟。印度宪法、1987年的菲律宾宪法和1988年的巴西宪法所描述的那套光荣理想，与现实世界里的规模贫困、不平等和权力剥夺差距之大，早就注定公众的不满将在某天被引爆。

要理解极右势力的崛起，就必须讨论到中产阶级的理想破灭。在20世纪的最后三十年里，中产阶级是全球南方独裁统治皆曾被推翻的核心因素；然而过去二十年中，自由民主并未兑现其承诺，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不升反降，使他们大失所望。他们转而对更激烈的政治方案抱持期待，甚至开始支持新自由主义，虽然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带来的成果有好有坏。这些政策侵蚀了一部分中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却也同时惠及一些下层阶级的人，形成了所谓的「充满野心的中产阶级(aspirational middle class)」——也就是那些在收入上不是中产阶级，却渴望成为中产阶级的人。为了迎合后者，Modi 与 Duterte、Bolsonaro 已经接受了新自由主义作为政策的一部分。相较于此，全球南方的极右政权则因机会主义的考量，而与新自由主义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由于不平等和贫困猖獗，许多人转向毒品与犯罪事业；对于犯罪和所谓「危险阶级」的恐惧心理，也在此情况下被加强，成为中产阶级向右派靠拢的原因之一。中产阶级对犯罪和毒

品的恐惧，无疑是巴西和菲律宾选举结果的核心因素。Duterte 手段高超，他将毒品和犯罪问题，与人民的社会背景分离，并将其形塑成一个所有阶层——不管是富人、中产阶级或穷人——都共同面临的主要问题。

反贪腐的立场同样对人民——不仅是中产阶级——有着强大的吸引力。「赶跑贪污者」的竞选主轴提供了选举活动动能。每个打着反贪腐诉求的政党，都在上台之后变得同样腐败；人们因此而对选举活动感到愤世嫉俗，并被 Modi 和 Duterte 这样的领导人吸引。民众也许和这些候选人在许多观点上不同，甚至认为 Duterte 会损害人敏的政治权，但他们能够展现清廉的形象——即便现实可能并非如此。

在巴西，大量选民支持 Bolsonaro 是为了惩罚工人党领导层的腐败。虽然所有政党都有腐败行为，但 Lula 的政党成为了众矢之的；这也许是因为工人党在上任前曾以自身的清廉为卖点，却在掌权后成为腐败的政府。事实上，前几任政府的腐败程度，和 Lula 与他的继任者 Dilma Rousseff 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比起毫不掩饰的恶行，伪善的代价反而更加庞大。

Duterte 和 Modi 在工人阶级、农民、城市和农村的穷人间，也同样享有广泛的支持，是不争的事实。不过下层阶级对这些领导者的支持程度与原因，或许与中产阶级有所不同。借 Antonio Gramsci 的话来说，相较于中产阶级

可能呈现于电视、网际网路和平面媒体上的观点——也就是「主动共识」，下层阶级更常以「被动共识」的模式为主。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直是舆论的主导者，在印度和菲律宾，有很大一部分这个阶层的人，便是 Duterte 和 Modi 的支持者。

最后，我们也必须将这些极右人物的魅力纳入讨论，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成功。Modi 和 Duterte 正是极具魅力的人物，不管他们说什么、做什么，似乎都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与容忍，这是难以用理性演算、阶级和政治恩惠 (patronage) 去解释的。和这两者相比，在全球北方，没有任何极右派人士能和它们一样，拥有如此庞大且全面的吸引力。不过在2020年的选举中，有超过七千四百万的美国人把票投给川普，比他在2016年获得的选票还多出了一千一百万张——这恰恰证明，川普的确有着能紧紧抓住政党与选民的超凡魅力。

> 结语

全球南方与北方的极右派政权确实有一些共同的特性，这篇文章则探究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极右派在当前全球规模的政治中，发展出了超越中间左派的政治声势——本文旨在为这样的现象，提供更加完善、深入的解释。■

來信寄至：

Walden Bello <waldenbello@yahoo.com>

> 拉丁美洲社会学的普世目标

Esteban Torres,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órdoba-CONICET, 阿根廷

〈全球对话〉的这一部分将提供一些拉丁美洲著名作者的创新理论、知识路线和未来研究计划。这些在共同行业中工作的人们每天都致力于建立新的理论工具，以便全面研究拉丁美洲的社会实体，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扩及整个世界社会。在肯认本节作者们各自国族身份的同时，他们皆认为还有一个实质性的拉丁美洲身份，并在他们的研究计划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也代表他们同时培育了针对区域、世界社会未来的知性贡献。绝大多数的客座作者都提出了一次更新、一场结构改革，或简单来说，一场针对当今世界社会学的革命。没有人愿意抑制自己的创造力，且所有人对于只是成为他人思想复制者的前景感到恐惧。他们每一位都针对区域和世界社会科学的现状、该领域所面临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挑战、知识的生产如何因应社会变迁过程向未来发展，提出自己的见解。

这群社会学家，纯粹凭藉其努力工作和才华，便在他们各自的国家、地区中脱颖而出，甚至也在西方世界不断增加其影响力。他们各个都怀有非凡

的志向，这点十分可贵。他们在研究上坚定付出，纷纷从新的社会理论出发。每一位作者都受到不同的启发，从不同研究对象、研究方向，到来自他们原始研究、理论创造和社会学变革目标中的研究问题。而在意识形态认同、规范性的解决方案、政治立场上，他们也存在差异。在这方面，多样性的聚合确认了一件事：在拉丁美洲，针对历史当前的重大问题，作者们可以借由在地化的阅读来创造自己的思想，并在他们自行产生的解释性社会理论中向前推进，最终为他们各自的社群规划具有视野的期望指标。

然而，这个段落中的所有差异都属于一个共同的、令人兴奋的抱负，这个抱负建构了每一个倡议，并源自拉丁美洲最光明的历史。每个思想脉络都建立在强力拒绝任何区域自给自足、拒绝在理论上将拉丁美洲视为次要等原则的基础之上。每位作者都视他们的拉丁美洲认同和生长脉络为一种正面、独特的价值，协助他们在世界舞台上彰显独立自主，而不是在世界社会中进行思考和行动的限制。少了这一股共同的、受源自于区域历史的各种解放性传统所影响产生的欣赏和感

激之心，就无法解释这里伴随着信念、力量和独创性的思想脉络。

我要提及的最后一件事是，本段落中绝大多数作者都参与了拉丁美洲社会学会(Consejo Latinoamericano de Ciencias Sociales, CLACSO)的一个工作小组「社会理论与拉丁美洲现实(Teoría social y realidad latinoamericana)」。我们创造了这个跨国的集体空间，召集了约40名研究人员，目前由Jose Mauricio Domingues和我本人进行协调，旨在克服拉丁美洲社会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现阶段产出自主性理论的缺乏。为了进一步推动这项愿景，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板块之间，建立一个世界社会学的平等理论对话。〈全球对话〉的共同编辑Klaus Dörre慷慨地邀请、开创这一个拉丁美洲段落，便是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在这个历史时刻，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全球化在地化(mundialization)精神。

來信寄自：

Esteban Torres

<esteban.torres@unc.edu.ar>

> 世界典范： 一个社会学的新提案

Esteban Torres,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órdoba-CONICET, 阿根廷



从二十一世纪初开始，世界上主要的社会变迁正在穷尽两个典范。这两个典范从其起源一直到今天，持续左右着社会学的发展，它们分别为：现代典范和反现代的后现代典范。这项议题引起关于典范转移的讨论。我则是提出一种新的、具有科学思想的后现代方案，称为「世界典范」(world paradigm, WP; 西班牙语为 paradigma mundialista 或 PM)¹。这个学术系统承载着关于世界社会、世界社会变革和世界社会学的新观念。我将在这里回顾其中一些要素。

> COVID-19盛行下的全球在地化

拉丁美洲社会学的关键变化，是针对两种同时发生的危机的反应：(1) 持续加重的新自由主义危机，和(2) 逐渐萌芽的、社会学和历史社会本身所构想的「社会」观念的危机。第一种危机，在全世界的国家重新中央集权化(state recentralization)过程中加剧了；至于第二种，来自一个空前的精神上、知识上的全球在地化过程(process of mental and intellectual mundialization)。观察拉丁美洲发现，上述的国家、全球在地化两种危机，随着各种因素而日益严峻，包括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拉丁美洲最后一波从下而上的区域一体化浪潮(2003-2015年)，以及当前的COVID-19大流行。如果新自由主义危机对反现代的后现代典范产生负面影响、对现代典范产生正面影响，同时「社会」观念的危机对两者都产生负面影响(尽管对现代典范的影响更具决定性)的话，有鑑于后者的新颖和

它在社会决定论方面的潜力，我会将关注重点放在后者。

COVID-19大流行是一重大事件，它高度加速了人类历史上首次精神、知识全球在地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内含至少三个核心元素：一、一个统一世界社会的初步构想，并完善地整合了国家、地区和全球范围。二、纪录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事实存在。三、一种直觉或佐证，认为世界社会不仅仅是现代的或「仍在现代化的过程中」。

上述的全球在地化过程显示现代、后现代的反现代典范日渐衰落。众所皆知，两者都是从社会学以民族社会为参考框架的前提出发。且不仅仅是任何一种民族社会的思想，而是一种带有自觉的、拘束性的视野，它伴随着意识形态上的变化，已经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从北半球传播。它最完善的版本，将民族社会的思想包装在一种渗透性和反思性的普遍主义中，并促进周边国家的学术界进行大规模同化，以使其历史社会获得价值。现代、后现代典范中存在着

>>

「COVID-19大流行是一重大事件，它高度加速了人类历史上首次精神、知识全球在地化的过程。」

不同种类的方法论、认识论和民族主义理论。如今，世界社会学中来自西方的多数全球化理论都处于这种拘束性的框架之内。

上述现代、后现代的反现代两种典范的日渐不足，不仅只在先前提到的两种危机中发现而已。它也明显呈现在1980年代起，拉丁美洲社会学结构重组的历史过程中，某种程度上世界社会学也是。这个重组和下列因素有关：社会学和非关学术的政治实践之间实质的脱节，以及社会学实践中科学、批判、政治三大动力之间学术上的脱节。这个脱钩(decoupling)的过程加剧了世界社会学的科学分解(scientific decomposition)和政治无能(political impotence)，同时缩减了政治行为者可利用的学术知识资源。

> 世界典范的科学计划

面对这种情况，进步派和左派社会学需要恢复其现代核心，同时超越它，走向新的世界典范。世界典范引入了一种社会学概念，即作为一种面向世界社会转型的本地化、多重本地化社

会科学力量。这个典范旨在创建一个新的后现代科学计划，提出将科学、批判与政治核心重新连结的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模型，并为社会学与政治学实践提供新的中介。我会着重于WP的第一个要素：科学计划，其由全球在地化原则、本土化原则和历史化原则²的辩证关系之中开展。全球在地化原则预设了社会是以世界为基底，而不是国家。这个前提的革命性，在于其翻转了现代和后现代的反现代典范之间的空间核方程(nuclear spatial equation)。全球在地化原则使我们得以框架出一个概念——世界社会是发生于以下三个系统层级互动之间的最高单位：(1)国际、地区、全球领域之间的关系，被视为是不可分割、不可简化的范围；(2)中心—边缘的关系；以及(3)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关系。

在地化原则强调，思考世界社会时，应考量到在地化的重要性。对世界典范来说，世界社会是一个不平衡的社会形式，其同时有着在地化和多重在地化的性质。每个在地化的节点，都是前述三个层级之间的不对称互动中，直接或间接的单点凝聚。就如同世界社会并非单一地区

在地化的成果，一个社会结构转变的完整愿景、全球范围的社会改革，也不能只是单点开花。这即是我们发起结构性的运动与计划，需要提倡「世界社会学」的创建；其能够将关于我们身处星球的、各种历史在地化性质的世界社会理论连结起来。■

来信寄至：

Esteban Torres

<esteban.torres@unc.edu.ar>

1. 欲知此提案的详细发展，请参见Torres, E. (2021) *La gran transformación de la sociología* [伟大社会学翻译]. Córdoba-Buenos Aires: FCS-CLACSO. 手稿已提交出版。

2. 由于空间因素，以及这两者是最具破坏性的元素，我们指得特别是前两个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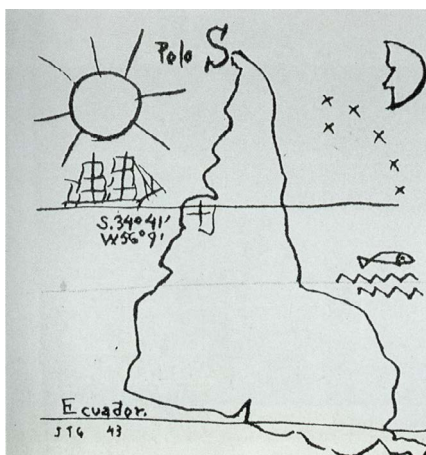
> 连结全球社会学和全球现代性

José Maurício Domingues, IESP-UERJ, 巴西

政治社会学在拉丁美洲具有深厚的传统。它一直是拉丁美洲社会学的核心部分，虽然一定不是唯一的（「文化」也很重要，以及一些较早的政治经济学开端）。政治社会学，随着特定学科（如政治学）的出现，而得以扩大和转型，其北美风貌也与先前更以社会为根基的社会学叙述形成对比。政治社会学产生了重要的理论见解，但如同拉丁美洲的常见情况，未能达成更广泛与全面的理论贡献目标。具体而言，现代性在特定政治维度上的特定发展，虽然被讨论和概念化，但通常分析只停留在区域层级。

> 社会理论的缺席

其中一个例子是 Quijano 以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 (industrial reserve army)」概念，讨论为何拉丁美洲有如此多过剩劳动力，并产生了他所谓的「边际极点 (marginal pole)」。在某个时间点，Quijano 意识到这个问题可能也出现在19世纪的欧洲，而移民解决了当时的问题。但他不敢更进一步（更不用说挑战马克思的一些想法了）。这位日耳曼人对「民粹主



这幅划是乌拉圭西班牙艺术家 Joaquín Torres García(1943)的水墨划《América Invertida》。反向的拉丁美洲大陆是对南美艺术强烈自信的描绘。
来源：创用CC。

义 (populism)」的讨论也是如此，他认为当现代化使群众「可以被利用」时，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民主政治制度吸收，所以投机的菁英便得以进行「操纵」。这本来可能指向对欧洲的进一步反思，但是日耳曼人（为了逃离法西斯主义从义大利移民到阿根廷）却将他的讨论限缩于只针对阿根廷，并在后来随同其他作者，将他的讨论范围延伸至整个拉丁美洲。他们都只到这里就停下来了。由 Pablo González Casanova 和 Rodolfo Stavenhagen 提出的「内部殖民主义 (internal colonialism)」概念，直指

现代、后殖民国家对原住民社区的侵犯，这本来可以提供一个对现代国家的大致描绘——因为实际上，其他地方也是以这种方式发展而来的。然而，他们却没有得出这个结论。Florestan Fernandes 甚至认为我们无法进行任何理论研究，因为缺乏专业的人才和资源，以及缺乏更迫切、具体的问题。

拉丁美洲社会学，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长期苦于缺乏理论化。或许这点目前更倾向于是一种全球现象，但拉丁美洲本身过往的限制也一并被混进这个问题当中。在纳入关于研究策略的讨论、理论和经验现实之间的关系之后，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我们应该先从特定的角度出发，再迈向普遍的程度吗？还是有必要——在拉丁美洲也是一先从属于这个次大陆和其他全球现代地区的一般理论问题下手？几十年前，Leopoldo Zea 观察到当欧洲人（和北美）视他们的普遍性为理所当然，并视他们的特殊为立即在概念上可概括的时，拉丁美洲人反而必须从他们的特殊起步，因为他们的普遍性原则上是被否认的。

>>

> 政治现代性理论

如果过去是如此，那么它便不再适用于现在。尽管现代性和它的起源尚存在争议，但现在已经没有人会认为西方的普遍性是现代性的主体了。有些人会谈到殖民和后殖民现代性、交织现代性、多重现代性等。此外，包括拉丁美洲在内，到处都有知识的积累，也包含理论知识，这使我们可以从最高层次的理论下手。对拉丁美洲、欧洲、非洲、美国和亚洲而言，情况都是如此。不可否认地，我们需要对脉络敏感，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的脉络是（或应该要是）全球的。如果我们不坚守在某个特定地方出生和／或繁殖的直接经验的话——反正整体而言，这也不是社会科学的好策略——这当然就应该是现在的情况。

这即是我的社会学研究正努力的方向。受拉丁美洲思想和某种「历史唯物论」影响，我决定修正有关「结构与能动性」的论辩，并重新思考社会生活中的持久与变动性。我由此得出了「集体主体性」和「社会创

造性」的理论，其中纳入创新的与历史的观点。我深入地探讨现代性主要的想像性与制度性元素，接着将主轴拉回拉丁美洲的现实，以「现代性的第三阶段」的概念对其进行分析。接下来，我将讨论延伸至全球现代性在全世界的扩张，以及其单一性、异质性和混合性。最后，我讲述自己现在所认为的，文明与解放议题的战略定位：现代性的政治层面。同时，我也认为是时候研究我关注已久的议题——马克思的「阐述方法」，并将其应用至政治层面的讨论。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并系统性地组织范畴，才能完整地讨论政治现代性、建立其动态趋势。

这促使我以批判理论的途径，提出一个扩及全球的政治现代性范畴阐述。我曾经试图统整各地的历史发展，然而真正重要的是要将这些发展纳入范畴分析系统。我的分析处理了想像与制度是如何开展，以及这个趋势从何种机制中产生并运作。权利形式、公民形式、法律、国家、自治、政治体系和政治政权，以及可想象的激进

民主、抽象与具体的关系、自由主义的扩张与限制，这些都构成了我持续发展的理论方法核心。除了这些范畴之外，与增强国家与公民自治有关的认同、分析、解释与预测，也都涵盖在其中。我最近在研究「真正的社会主义」，并定义其为「专制的集体主义」——虽然不是社会主义，却是一种寄生于现代性的独创社会形式。

关于此一现代性的整体理论性诠释，已经有一些著作发表；而我打算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对政治现代性做出最终的、更完善的理论描述。前述在理论与价值论上的野心，虽然因其拉丁美洲的背景，而受到普遍主义者的扬弃，却仍是全球社会学研究取径的重要部分。■

來信寄至：

José Maurício Domingues
<jmdomingues@iesp.uerj.br>

> 将理论历史化： 给拉丁美洲的提案

Viviane Brachet-Márquez, El Colegio de México, 墨西哥



1810年至1860年间发生了重大的领土变化：八个国家诞生(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厄瓜多尔、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巴拉圭、乌拉圭)，墨西哥的北部领土被美国占领。
来源：创用CC。

过去，中央国家（相对于外围）所实践的社会理论一直是静态的，亦即将社会秩序视为缺乏广泛冲突，并将冲突视为失序的一项指标。它还尝试透过假设性演绎推理（hypothetical-deductive reasoning）来预测稳定的社会持续性，从而变得更加「科学」。甚至正当社会学之父们经历着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剧烈转变时，他们也将这项转变描绘成一个缺乏理论化的过程，有着固定的出发点和到达点：即从社区（Gemeinschaft）到社会（Gesellschaft）。

基于这种一般模型，拉丁美洲国家便显得既不完善又尚未完成，它们不是从「传统」迈向「现代」，就是从未开发（或发达不足、开发中）迈向更接近「已开发」。这项转变「之间（in

between）」的历史过程得到了广泛描述，但整体而言却没有被理论化¹。这样的结局，在任何情况下，永远是拉丁美洲基于世界的力量（或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而不完美、不均匀地「发展」了起来，而人们自独立后两世纪以来，在建立社会秩序时所扮演的角色，则仅有微小的影响。

> 拉丁美洲社会秩序历史建构

我有一个提案，也就是拉丁美洲作为一个区域，可以被丰富地理论化，只要我们认知到拉丁美洲的历史性，并从以下前提开始进行：社会秩序，无论在任何地理环境，都是极其复杂的、历史建构的、不定的社会过程的产物。分析拉丁美洲社会秩序时，核心问题需要关注和历史上政治系统有关的行动者，由此产生以下问题：（1）行动者是谁、是为了谁的利益（个体、父权家庭、原住民社群或

资本家获益的利益最大化）；和（2）由什么动态原则驱动（系统性、机械式或行动者）。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何种理论视角可以将19个拉丁美洲国家的集合变得可以系统性对话、而不是毫无关联的案例。

在这篇简短的文章中，我只能概略地摘述我在这方面的的工作，如何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²。一般的理论论点可以总结如下：拉丁美洲历史上所产生的是一系列受限于时空（spatio-temporally limited）的社会秩序，这些社会秩序由彼此混合、经常相互矛盾的规则、规范和符号所组成，它们不是成为霸权（hegemonic），就是不再被广泛共享或强制执行。换言之，这个社会过程的一些特定结果，可能已经反过来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去制度化（de-institutionalized）和重新制度化

>>

(re-institutionalized)了,同时这里作为国际地缘政治、市场竞争过程的一部分,也面临着外国和世界企业的入侵。

从这个角度来看,牵动拉丁美洲独立后历史的是政治系统里不同行动者之间的交互冲突和合作,他们意图强化菁英们的财富、权威和权力,这些菁英则与政治体系霸权在不同时间/地点有密切关联。发挥影响的还有从属群体(subaltern groups)对标记自己日常生活的事件的反应方式,其反应又反过来强化或修改了这些过程。图1抽象地呈现了这些历史发展,其中可列举出相对应的经验事实,因为它们不只发生在本地区的不同国家,还共享了历史上重复出现过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依此观点,关键的政治系统内行动者,以及人民、社群和组织,每天都透过重制其生活和理解其经验来

建立社会秩序。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一样,这些安排整体来说并没有达成共识或平等,因而错过或抵消了许多进步改变的机会。但这就是我们可以、也一定要进行理论化的现实情况,我们要摆脱以欧洲为中心的迷思,进行系统性研究。

为了以经验方法探讨这一整套过程,现正进行的研究将聚焦于国家与其他系统性秩序、强力的社会团体、资本主义企业和外部国家,他们彼此在不同时间的关系为何,正如图1所示。为了达到霸权,各国一直致力于主导它们的领土³、达成经济自主,和捍卫其主权。在这么做的同时,它们施加了所有可想的权力,以控制它们的人口;从积累体制(regimes of accumulation)中取走他们的份;并对更加强势的外部势力做出让步。

上述大致上为拉丁美洲各国扮演政治体系时采取的行动。尽管出自于独立战争后的负债累累,且相较于天主梵蒂冈、大领地(latifundio)⁴或军事力量,手中仅握有有限的权力和权威,同时不断地受到来自经济上和技术上较先进国家的干扰,拉丁美洲各国还是做到了。

> 结论

从这个角度检视,从1810年以来拉丁美洲国家所面临的问题⁵,与从1500年代以来欧洲国家所经历的那些问题⁶截然不同,然而两者却一再被比较,这些比较大多是不利且不合时宜的。通过采用这种研究方法,我们可以理论化拉丁美洲社会秩序的形成和失落,不是按照欧洲中心本位可能如何的普遍原则,而是以从1810年以来,在格兰河(Rio Grande)⁷到火地群岛(Tierra del Fuego)之间所创造、转变和中断的历史动态当中,具可比性且考量历史变化的实际案例。■

来信寄至:

Viviane Brachet-Márquez
<brachet@colmex.m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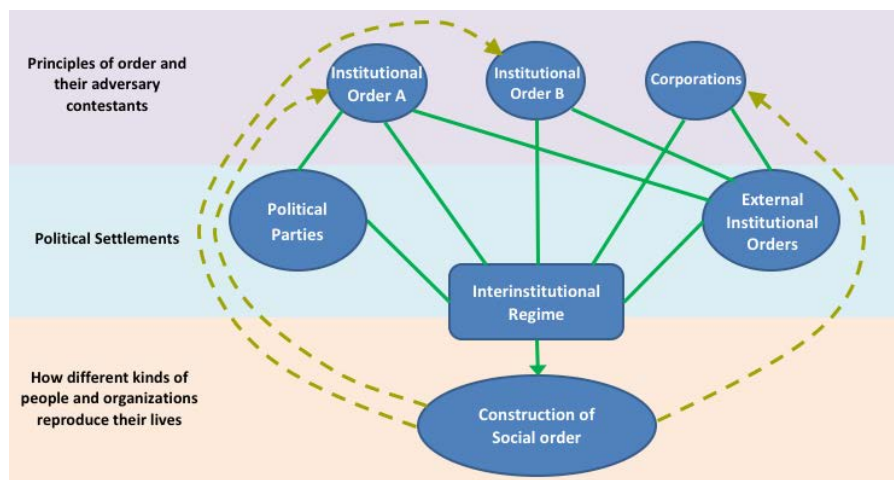


图1。来源: Viviane Brachet-Marquez。

1.除了依赖和世界体系理论学者如Cardoso和Faletto、Wallerstein和Arrighi以及Boserup和Hirschman。

2.本书预计将于2021年7月完成,并于2022年以英文和西班牙语出版。

3.韦伯式的观念,将国家作为一个实体,视为透过垄断合法的暴力手段来统治其领土,在这里被认为是历史上的问题,而非定义上的问题。

4.Latifundio是西班牙语词汇,指大型土地财产。

5.1810年5月标志着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墨西哥的独立战争开始。

6.比较仅限于英国、法国或普鲁士,其余24个欧洲国家则省略不谈。

7.在1848年美国吞并墨西哥一半以上的领土后,格兰河成为最北端的边界。

> 相互依赖性的再思考

Sérgio Costa, 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 德国



2019年8月，巴西农村女性工人游行，巴西利亚。

来源：Renata C. Motta, FU Berlin。

> 身负重任的社会学

自 诞生以来，社会学就一直需要「证明自己」——人们总会质疑：社会学与其他类似的学科有什么区别？其研究结果有什么实用性？社会学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能考量到背景脉络，以及行动者在众多现象中的意义，来对社会过程进行分析。正如我在《后殖民、去殖民、黑人批判：接合与裂缝》(Postcoloniality-Decoloniality-Black Critique: Joints and Fissures, Campus 2014年出版)一书中谈到的：最

近的社会变动与蓬勃的学术发展，逐渐为社会学带来了挑战，考验其掌握结构与意义之间关系的能力。

首先，社会学中的研究倾向出现转变，不是将主题的范围限缩至结构(经济主义)层面，就是将社会过程完全置于符号层面(文化主义)讨论。在这两种情况中，社会学的核心关怀，也就是由交错的构造、意义与表征共同形构的「社会」，却好像被遗忘了；这和 Hans-Georg Soeffner 以及 Karl Lichtblau 等德国社会学家的描述是一致的。社会学陷于经济/文化取向的挣扎，面

临了分析当代世界的挑战——然而战后社会学家所预想的现代社会模型，却和现实中的完全不同。现代性在社会学中所对应的，是一个将秩序建立在安定的边界，以及稳固身份认同上的世界：西方与非西方、女人与男人、原生与外来、现代与传统、德国的/土耳其的与德国-土耳其的。

第二个转变，与社会过程以及社会生命的全球化有关。社会学仍然缺乏一个足够有效的理论工具，能以国族社会集合以外的形式去理解世界社会(world society)。再者，现代性的形塑也不再由西方国家

>>

主导。后殖民理论家曾强调，西方国家的主导地位，是构成社会学中现代性概念的根本元素；然而这种观点是缺乏想像与深入理解的。举例而言，宝莱坞、好莱坞和拉美肥皂剧(telenovelas)的交织可能促成21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潮；拉丁美洲也可能发展成中国的周边国家之一。社会学试图将国族社会学的观点应用于其馀的未知世界地区，以探讨全球的社会进程；社会因此被「世界社会」所取代，现代化则被「全球化」取代。这些新的概念虽然被应用在新的架构中，却保留了旧有的国族特性。这导致社会学缺乏真正创新的研究发现，也难以触及那些超出国族范畴的结构与意义之互动。

第三点，则是物种间的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社会学成立于人类中心主义的鼎盛时期，并一直将人类社会视为利用周围自然环境的集体存在。这与近三十年来后人类研究的学术关怀是互相矛盾的——即人类与非人类(包括植物、动物、精神和人工制品)之间，有着相互依赖的关系。我们与动、植物存在着各种互动关系，病毒与细菌甚至生存于人类体内；然而社会学倾向将社会与自然环境分开讨论，忽视了人类与其馀生命形式之间紧密的关系网路。这使得社会学不再能理解维生(vital)与致死(lethal)的过程，与之相关的物种相互依赖性也不受关注。正如凯瑟琳·普莱斯在《后数位化科学与教育(Postdigital Science and Education)》上发表的文章《当物种与数

据相遇(When Species and Data Meet)》所言，在当前的COVID-19大流行下，这样的现象更加被凸显出来。

> 拉丁美洲的贡献

拉丁美洲的社会学传统与发展出的各种思潮，为社会学提供了开创性的贡献和反思，并能为其面临挑战提供协助。

早在1950年代的拉丁美洲，就有学者开始关注结构、社会意义和表征之间的关系。Rodolfo Stavenhagen、Florestan Fernandes、Heleieth Saffioti 等社会科学家，更是在社会科学出现「交织性」的概念之前，便试图理解族群与阶级、种族与阶级、性别与阶级如何交织，并构成人的社会所在(social places)，又如何影响其社会位置、自我表现形式与行动。在2008年出版的《全球纠缠不平等、概念辩论和来自拉丁美洲的证据》(Global Entangled inequality, Conceptual Debates and Evidence from Latin America)一书中，阿根廷社会学家 Elizabeth Jelin 也重新整理了相关论辩。

依赖学派与其分支学者，已经在「社会过程与社会生命的全球化」此一研究领域向我们阐明，从过去的殖民与奴隶制度发展至近代的经济资本主义模式、在不同的时间点与地区中，经济结构和社会性模式如何互相影响。在2019年发表于《当代社会学》的《拉丁美洲现代性研究：谱

系与困境》(The research on modernity in Latin America: lineage and dilemmas)一文中，我便讨论了这个命题。

如何公平地处理物种间的相互依赖性议题，是社会学面临的难题之一。然而拉丁美洲的学者，仍能从本土传统的观点出发，为此议题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概念，其中更有许多概念已经广泛传播于世界各地。例如 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 在其著作中提出的美洲印第安人视角主义以及美好生活(buen vivir)的概念，即在安第斯地区有深厚的发展。这些思想风潮多以描述分析或地球伦理学的观点，去思考人与非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

这一系列的理论传统与剧码，将使得拉丁美洲的社会学，可能在接下来的社会学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应致力研究相互依赖性的概念，并能涵盖文章前述的不同层面。为了参与社会学的重新建构，拉丁美洲的社会学需要再次检视这些学术传统，并将其转译成能有效应用于当代理论辩证的形式。我们也要在学术、非学术，以及南方、北方社会学的知识生产者之间，创造对等的合作模式；拉丁美洲能够在当代社会学的重建中，有多少规模和品质的贡献，就取决于这些人将如何团结。■

來信寄至：

Sérgio Costa

<sergio.costa@fu-berlin.de>

> 危机的系统理论： 忽视的时代

Aldo Mascareño, Centro de Estudios Públicos, 智利



来源: Unsplash 网站的李林。

我近五年的研究重心，在于为这些复杂的社会危机，发展出一个系统性的理论。原因有二：首先，自法国大革命至今，危机仍然没有从批判的概念中分离出来；其次是在批判理论中，危机与批判之间的差异，仍被视作其理论与政治实作的单位之一。事实上，系统理论系统性地避谈危机这个概念。在鲁曼的理解中，危机是现代社会的消极的自我表述；也因此，危机的运作机制一直是系统/社会环境关系之间被隐藏的价值；直到最近才开始出现针对批判性系统理论超现实可能性的反思。要注意的是，复杂的社会危机，仍是二十一世纪的标志性特征。

> 现代社会的黑暗面

过去的二十年间，现代社会的黑暗面透过特定纷乱，以

完全不同于上个世代的形式展现出来。这些被我们称为「危机」的事件，在社会的变革下展现出前所未有的韧性、延展与周期性；我们在其中经历的那些极为复杂的社会危机，更戏剧化地警示着我们：现代社会已经无法承载全球相互连结、多层次的观点，也难以达成人们的期望。在全球现代性之下，在某地区发生的事情带来的后果，却要由其他地区的人们承受，世界各处都充斥着不满和隔阂。在本文中，我将这段曲折的时期称为「忽视的时代」。

世纪之初，伴随着世界大战、大屠杀和对于人权发展的期望，车诺比事件为新网路化的后地方时代拉开了序幕。紧接着，动荡的忽视世纪开始了。首先是双子星大楼，作为现代性符号扩张与自我防卫特性的象征，在象征着大规模杀伤武器的飞机撞击下倒塌，成为了

开幕式的欢迎礼炮。再来则是新世纪的开端，过去的二十年内，伦敦、马德里、尼斯、巴黎、波士顿发生了恐攻事件，中东、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则出现屠杀和违反人权的行为。除了家(home)以外，好像任何地方都是不安全的。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日益严重的气候变迁、不断扩张的宗教的基本教义派，以及跨意识形态的、强烈排外的民粹主义，都像是在告诉我们——即使是家乡(home)，也很容易成为受忽视的对象。

2008年的金融动荡，显然是网路化忽视时代的系统性崩溃——全球的相互连结与结构同质程度过大，使得世界变得狭隘且快速，并造成人们注意到更多跨时空的规范性问题。各地的气候变迁更加突然且剧烈，凸显了这艘「地球飞船(spaceship Earth)」的相互

>>

「全球现代性面对着世界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人们经历着不满和隔阂，他们遭受着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情的后果。我称之为忽视的时代。」

连结性，也促使更多问题浮上台面：永续性的国际协议到底是抱持着良好的政治意图，又或是在规范性的约束力之下促成的决定？除此之外，基本教义派的领土与数量扩张，以及其与西方生活中心的连结，更是让传统国界的缺陷暴露于世；基本教义派在人权的煽动性论述中佔据突破口并成为议题的讨论焦点，尤其在后物质时代对世界不抱期待的年轻人心中有着重要地位。从传统左派的Chávez-Maduro 政权到右派的 Le Pen、川普、Bolsonaro 等案例，我们也可以看到民粹主义利用了网路化忽视时代的规范性破口，重新建立民族主义与仇外主义的论述，并试图借此将来自国家之外的影响与需求隔离在外。

> 关键过渡理论

对未来的历史学家来说，2011年也许会是新现代性规范意识的起始点。当然，在2011这个时间点之前，事情就已经有了迹象；如2000年始于南斯拉夫、并接连在多个前苏联国家发动的颜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以及2005年发生在巴黎周边地区的动乱。2011年起，更有一波反对忽视的社会运动浪潮蔓延

全球——佔领华尔街、愤怒运动(Indignados)、中欧以及拉丁美洲的暴动、阿拉伯之春等行动，反映着各地人民溢于言表的不满。过去几年里，中东到欧洲、中美洲到美国的大规模移民，以及因国家崩坏而从海地和委内瑞拉移民至拉丁美洲的人民，都是这种规范性耗竭的必然结果。总而言之，人们的动力不仅来自于生存动机，也来自对于规范性期望的实现——意即那些现代性一开始所承诺却又忽视的期望。

我认为相较于其他取径，社会系统理论在面对这类复杂事件时有更多优势。第一，系统理论强调了自主性世界体系的出现，以及其时常有着超越人类可能性、国家规范的控制力。第二，这个理论指出自主性系统之间有着极高的相互依赖性，而「自主性」与「相互依赖性」的组合，可能会导致更多冲突与矛盾。第三，社会系统理论也清楚指出，系统的运作是跨国的，整体区域极可能因自身的盲目，或是对边陲地区的忽视而体系崩溃。第四，系统理论向我们揭示现今的社会可能隐含的问题：在更高的复杂性与风险之下，我们要面对的并不是如何「解决」问题，而是如何生存于问题之下并与其共处。

在这份研究中，我提供了一个取径，使我们得以理解数十年来，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中出现的危机，并揭示其韧性、延展性与周期性。其中，我将关键过渡(critical transition)以危机的概念替换，也在此过程中整理了许多近年来实验科学中关于复杂性理论的研究发展，例如生态学、物理学、图学等等，这些都是社会学平时不会接触到的。我试图借由在关键过渡(theory of critical transitions)这个理论框架之下提出一个次理论，来为新型态的复杂现象提供解答：它们皆是在这个忽视的时代中，反复出现且难以控制的巨大危机。■

來信寄至：

Aldo Mascareño

<amascareno@cepchile.cl>

> 拉丁美洲

新自由主义探究¹

Verónica Gago, Universidad de Buenos Aires-UNSAM-CONICET, 阿根廷

在《由下而上的新自由主义：巴洛克经济与流行语用学》²一书中，我将深入新自由主义的概念，讨论其如何影响理论辩题的发展、在这个地区有着怎样的历史脉络，并追溯抗争的起源；我也试图挑战那些认为新自由主义等于「市场」、相反于「国家干预」的想法。对这些辩论而言，参照拉丁美洲来描述后新自由主义的情境，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我尝试跳脱过去的新自由主义概念，亦即新自由主义是由上而下的一组政策，且是经过结构性的规划。此外，我们应该要认知到，大众对于抵抗、重构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剥削，已经做出了许多尝试；我提出的「由下而上的新自由主义」概念，正反映出这点。我想要透过这样的观点，来挑战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整体解释，以及那些以「底层主体成为最终受害者」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我的研究焦点，会是新自由主义的连续性与不连续性如何在各方面作用。相比于政治体系的影响，这个问题背后

涉及更加复杂的逻辑。我想借由「巴洛克经济体」一词指出的，是饱和空间生产与平民倡议的时间、逻辑运作方式，已经逐渐过时。在研究中，我会以此概念来讨论新自由主义的具体功能，并描述着名经济体的政治结构如何形成；其中，本应是「受害者」的人又如何将政治结构中转为抗争场域，作为纯粹商业计算准则的新自由主义理性(neoliberal reason)，又怎么被他们转变、破除并重塑。

针对新自由主义的内部与外部抗争，是以反对剥夺，以及反对经济制度成为私人剥夺手段与新的价值开发形式为诉求。这些行动阐明了新自由主义在受到人们的诠释与挪用下，呈现出自主性与服从性之间，相互冲突的庞杂性质。

如果新自由主义会受特定的抗争循环影响，并减小其暴力的规模，那我们就必须更进一步讨论。我们要如何理解新自由主义在形式上的持久性和重塑性，同时破解人们的迷思——新自由主义真的能够

借由生命与资本的平等，消灭所有对立吗？换句话说：新自由主义之中存在着怎样的冲突，其又如何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变异？

> 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取径

我最近的研究也持续以女性主义的角度分析新自由主义；这包含近期的两本作品：与 Luci Cavallero 合着³的《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债务》(A Feminist Reading of Debt)以及《La potencia feminista. O el deseo de cambiarlo todo.》⁴。在当代女性主义中，新自由主义一直是核心的特质，也因此成为其国际主义中的重要元素。这个论点是基于三个理由：首先，对于诠释那些首次被理解为冲突的事件，以及厘清其中的关系来说，「分析」是其中的关键；其次，这让我们在面对新自由主义如何转译、处理冲突的问题时，能透过多元文化主义视角，以及其能够平息争端的包容性质，对此议题辩论、提出挑战。最后，这让我们能评估在国际之间、尤其是拉丁美洲的案例中，崛起的保守势

「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已经转变，反映出全球对生殖劳动的更大依赖。但是为什么新自由主义会发生这样的变异呢？」

力如何回应女性主义。

新自由主义的暴力引起结构性的调整与变动，并使得剥削与个体的生产密不可分；在吞噬一切的社会结构下，个体被迫待在危险的处境中，却仍为了取得财富而奋斗。前述的思考观点，正好提供了一个解释新自由主义暴力如何带来影响的理论框架。

我主要讨论四种暴力情境：(1) 家庭内部的暴力，来自于男性养家角色的危机。男性因劳动市场中有着较高的地位，而取得了家庭中的特权地位，如今其权威却逐渐消失。(2) 新形式的暴力组织，由于非法经济扩大、垄断了其他的资源供应方式，而成为了民间社区的权威角色。(3) 跨国公司透过侵占、掠夺公共土地和资源，剥夺其他经济体的物质自主权。(4) 各种形式的剥削和价值开发，促使社会生活金融化，更在债务工具的发达下成为日常。

将新自由主义与开发主义(extractivism)一同纳入讨论，对于从帝国层面理解新自由主义(在欧洲大西洋的观点中，此点较少被讨论)，以及厘清当前暴力的来源非常重要。

许多女性主义学者认为，父权体制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不如以往，反映了全球对生育劳动的依赖更加庞大。这引发了另一个问题：新自由主义何以变异至此？

> 金融开发主义

我目前关注的问题，是金融化如何创造生产与再生产的新途径。在拉丁美洲的经济体内部、非工资经济体与过去的非生产经济体中，债务如何进行价值开发？为了解此议题，我们须将金融制度视为价值开发及推动性别议题进程的一种机制——或是说某种生产与生育间的关系。我们分析了这些债务如何利用了性别议题，并加剧日常生育的被殖民(Cavallero 和 Gago, 2020)；同时也回应女性、女同性恋和跨性别女性在女性主义运动思潮中，对经济自主权的诉求。考虑到科技的复杂性，以及其对于日常生活的影响，我们应该将金融理解为资本的开发逻辑，也正是这样的内涵，构成了我们所说的「金融开发主义」。

在我的理解中，大众、原住民、反对政府者、黑人、酷儿等特质也说明，为何女性主义运动善用集体的主体化，能成为抵抗新自由主义权力扩张与金融化无限乌托邦的关键要素。■

来信寄至：

Verónica Gago

<verogago76@gmail.com>

1. 由 Liz Mason-Deese 译为英文。
2. 2014年，由 Tinta Limón 于阿根廷出版；2015年由 Traficantes de Sueños 于西班牙出版；2017年在美国由杜克大学出版(Liz Mason-Deese 译)；2018年，于玻利维亚由 Autodeterminación 评论出版，于巴西则由 Editora Elefante 出版(Igor Peres 译)，并由 Raisons D'agir 于2020年在法国出版(Mila Ivanovic 译)以删减后的形式与其他论文一同发表。
3. 2019年由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在阿根廷出版；2020年，义大利语版本由 Ombre Corte (Nicolás Martino 译)出版；英文版则于2021年由冥王星出版社出版(Liz Mason-Deese 译)。
4. 2018年由 Tinta Limón 在阿根廷出版；2020年由 Editora Elefante (Igor Peres 译)于巴西出版；并分别由 La Sinistra Pez en el Árbol、Verso 在秘鲁、墨西哥与美国，以《女性主义国际》为书名出版(Liz Mason-Deese 译)。

> 迈向后自由语法

Carmen Ilizarbe,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l Perú, 秘鲁



这次名为「Marcha de los Cuatro Suyos」的集会标志着藤森总统执政的结束。2000年，数千人聚集在秘鲁街头，抗议选举舞弊，因此树立了民主的强烈信号。
来源：创用CC。

自二十一世纪以来最重要的政治现象，莫过于人们对代议民主的自由主义式的理解(liberal understanding)出现严重的衰败，甚至侵蚀。政治党派的合法性危机正在世界各地发生，然而危机不仅于此。有关「代议制度是一种可运行的政治体制」的想法正出现危机，且很可能是无法回复的。考量到代议制的概念是所有当代民主政体制度设计的根据，代议制的形成更是与现代国家起初概念化的过程紧密相关。因此，至少自霍布斯(Thomas

Hobbes)以来，我们便习惯于「权力可以同时被委派并维持着」的概念。「代」议制的谎言—假装那些实际上在审议和决策过程中缺席的人们仍然借由发声权和投票权出席—是当代民主政体发展的根基。我在先前已主张，这个谎言已经崩坏，而代议制的根本概念(不仅是那些使其运作的关键制度和程序)也受到了影响。

> 「代议政治崩坏」的研究进程

回应政治中介制度的脱节，以及有鉴于统治者与人民

间的断裂，一种新政治上自我代表(self-representation)形式出现，它绕开了政党及其议程，也绕过代议体制下所规划的制度管道。但是，政治场域并没有被抛弃。在长达数十年的中期进程中，我们见证了社会的再政治化和人民主权的再次出现，有时它甚至能转变成一股制宪的力量，正如智利的案例中所展现的。

在此脉络下，可以将人民主权的多元形式看作是对政治的理解与建构现况出现重大改变的征兆。因此，当中介失败会

>>

如何?当代议机制不再如以往的运作会如何?当代议制的概念崩坏又会如何?这些都值得探讨。我在接下来几年的研究进程将关注与此过程相关的两个动态:(1)因正式的代议制度的衰退或消失而出现的政治系统变化,及(2)会与国家相互动的不同自我代表形式及新政治主体的出现。

关于第一项研究,我对新兴的反民主形式感兴趣。威权主义的出(再)现、法西斯主义,甚至是极权主义政府近年来日趋可见,不论在自古以来代议民主发展困难的国家及地区(巴西作为拉丁美洲的代表案例),抑或是在有坚实民主传统的国家及地区(美国作为北半球的代表案例)。同样的,那些最近在努力确立代议民主制度框架的国家,如秘鲁、哥伦比亚、智利、玻利维亚、以及厄瓜多尔,也发展出违背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的反民主政府作为。如何解释反民主的政府透

过选举当选的悖论?而这对民主的延续带来什么后果?什么制度形式和机制确立了当今的威权规则?在威权主导的脉络下又出现什么样的回应?今日的反民主情境背后的批判性分析有什么样的概念或理论基础?

第二项研究,我感兴趣于研究人民主权的概念如何形成并再次出现。综观南北、横跨东西,我们见证到逐渐增长的多元社会运动力量,对带来可见社会影响的经济危机做出回应,也对缺乏手段的政治代议做出反馈。这些远远外溢出了既有的表达异见或不满管道的群众力量,是筋疲力竭的展现,却也为由下而上的政治力量与计划开启了重新阐述的空间。这些形式的群众再现有什么样的特征?这是政治主体的宪法的新形式吗?这为政治的民主化开启了什么样的可能性?这又会多大程度、以什么样的方式帮助反民主政治的阐述呢?

> 超越自由主义语法的边界

我接下来几年的研究进程想了解国家—社会互动的动态,关注社会契约可能的革新形式,并超越由自由民主理论所发展的霸权概念架构。在主题上,这包含了对民主和民主化理论的批判,并且也同时背离社会运动理论,以更好地阐明这个社会—政治表达与参与的新形式的潜力。整体来说,这个计划将同时包含发展新的分类方式与途径,抛弃自由主义式的叙事方法,以更充分地理解正在发生的政治变革过程。■

來信寄至:

Carmen Ilizarbe

<cilizarbe@pucp.pe>

> 拉丁美洲的尺度、不平等及菁英

Mariana Heredia,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San Martín-CONICET, 阿根廷



二十世纪阿根廷寡头政治。

> 逐渐增加的关注与时下讨论

当 贫穷的比率持续不坠甚至增加、当庞大的财富被累积、当新的政治领袖出现造成制度紧张，菁英就再次地受到学术与大众的关注。现在，他们成为不同、甚至对立的立场者批评的对象：有些人批评企业太贪婪，有些人批评政治无能。

在关于菁英的研究中，没有任何学术创新跟着这波批评出现。在 Shamus Khan 对最新的文献的评论中，他对这些「时髦」的讨论提出警告。对菁英采取一个新的研究途径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在不同传统中对此概念所使用的不同词汇，菁英、上层阶级、寡头、统治阶级、布尔乔亚、有钱人、优势

族群等皆是同义词，彷彿全都指向同一个概念。第二个挑战是社会科学及其方法论途径之间的分裂。

在许多学者与观察家对于精英的研究中，他们强调自十八世纪末以来就被赋予这个群体的某些特质：有钱有权的人都是很有野心且少有顾虑的、他们的孩子继承他们的位置但没有继承他们的「美德」、以及仅存在于特定团体中的交流。简言之，面对史无前例的不平等，我们仍然着迷于上述的特征，以及菁英与普罗大众间的对比。工作与工人通常与历史的关系较为密且：他们带领主要的变革，或者，至少，这些变革是受到他们的影响。但是，资本、权力，及其主导者的再制似乎不为所动。

> 拉丁美洲的现实

社会理论—特别是在拉丁美洲所发展的一透过强调尺度的重要性，及探讨菁英与当地社会的连结，提供对该区域不平等的洞见。拉丁美洲的实际情况对批判理论提出挑战。由于该区域自殖民时期以来的受支配角色，战略资源仍掌握在外国人或欧洲人后裔手中。单以国家的尺度不足以理解拉丁美洲的社会金字塔结构。同时，该地区大多数的国家都高度仰赖原物料的出口和剩馀劳动价值。

面对外国势力强烈的影响，拉丁美洲菁英灵活的适应了时代的挑战。首先是所谓的寡头体制：他们施加新殖民主义秩序于国家领土上、压迫原

>>

住民、与欧洲特使建立密切关系、并且建立阻碍大众参与的政治制度。随后，民族资产阶级出现在最大的几个国家中，通常伴随着对民族运动与军事政权的支持，该资产阶级与都市和工业进步、大量劳动力的雇用，及促进国内生产与消费的政策十分相关。

基于这样的传统，可以看出近年对富人概念化方式的限制。Piketty 和 Oxfam 指出不平等日趋严重，并强调税收作为一种创新的收入分配方式，而其他学者则强调，在当前资本主义的循环中，资本将更加流动且去殖民化。然而，至少在拉丁美洲，这些数据并不特别可靠，「有钱人」被证实是高度异质的，仅仅基于对富裕的谴责而产生的理论便非常不令人满意。富人是五花八门的：富人世家与新贵、流动与非流动资产、依赖资源的与依赖劳动的、居住在该地区的与在国外积累财富的。因此，如果目标是要减少不平等，我们无法在萨尔瓦多和法国采取同样的策略。拉丁美洲有很大一部份的财富并不掌握在拉丁美洲人手中，这些财富也不存在其境内。

> 克服对「富人」概念化的缺乏

要以更精确的观点掌握拉丁美洲的菁英，有三个关键：具体指认出不平等、衡量不平等所适用的尺度，以及菁英所能获得的资源类型。

最主要的经济不平等与是否有能力进行(或暂停)能影响自然与社会的大型投资计划有关。当前，大型投资机构与主导此区域的主要国际公司为这样的不平等提供了全球的面向。当资本日趋流动且去个人化，经济精英现已不再只包含生产工具的持有者、大型雇主，或当地的富裕阶层：在多种领域耕耘的人，财经、法律、科技等领域的经营者和专业者，现在也参与到资本的管理当中。

相反的，最主要的社会不平等则是精英在住房、教育、医疗、文化的供给上享有的优势，在社会关系上尤其严重，因为这种不平等并不会仅随着财富的增长而等比例增加。当国家放弃提供普及化、高品质的服务的目标，权利成为商品，谁是菁英(成功的专业人员、高阶公务员或中型企业主)就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社会精英享有其他公民没有的机会。

最后，政治不平等取决于民众动员、建立支持、以及发挥影响的能力。今日，经济全球化与去中心化侵蚀了代议体制的制度性资源，许多政治人物会同时考量经济利益。当认同导向的需求和差异提升，政府不得不向国外寻求资本，并建立包含了暴戾、机会主义的地方领袖的联盟。

> 分散且隐晦的层级结构

指出经济、社会、政治菁英的差异是重要的，尽管他们之间仍有连结。Michael Mann 着眼于区分「社会空间权力网路」—任职期限有限的团体和机构所追求的权威—以及无形的权力，这种权力在没有明确的核心或直接命令的情况下，透过去中心化的实践而自发地扩展。领导者的权威说明了第一种权力(施加于…的权力)，而市场自律或关税惯性则说明了第二种权力(来自于…的权力)。这个新提出的观点与 Albert Hirschman 的相似：他认为，全球化市场加强了商人放弃无利可图领土的能力(叛离)，多元的行动者以街头抗争或社群媒体表达不满(抗议)，但政权和公共政策所需要的忠诚与服从则被侵蚀了。

分析财富与权力显然是降低不平等的重要任务。然而，财富与权力迷幻的吸引力与对其不分青红皂白的批评是同时存在的，两者同样的对社会共存带来威胁，也都无法带来进步。■

来信寄至：

Mariana Heredia

<mariana.heredia@conicet.gov.ar>

> 原始积累与法律批判

Guilherme Leite Gonçalves, Rio de Janeiro State University, 巴西



这是Diego Rivera(1929- 1945)在墨西哥城国民宫殿(Palacio Nacional)壁划的一部分,描绘了西班牙对墨西哥的征服。

法律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这个问题的标准回答范式通常是资本主义与民主两者间的差异与摩擦。在这个范式中浮现两种观点:首先,可得的激励资源不足以合法化国家对晚近资本主义的干预;其二,法律被认为是资本和权力积累的事实上限制一然而也只有当此积累释放出许多导向普遍不同意的策略行动者时。两者皆与 Jürgen

Habermas 的理论中的规范基础有关。

此范式的目的是为了将法律和民主视为一个整体的、对各种情境皆适用的原则,好似法制民主的论述可以从其构成的物质利益中分离出来。借由不承认法律作为当前分歧的一部份,上述答案忽略了连结积累与合法性的法律安排。当我们看到对晚近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的预测尚未被确认,

这一点就更加清楚了。不只是新自由主义启动了新的动力来源,金融资本主义及将其重新商品化的行动者也能用法律将其投机行为合法化。

> 法律形式

相对于资本主义/民主的标准范式,对法律形式的批评(由 Evgeny Pashukanis 提出)提供了以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来分析法律的想法。他的出发

点是基于下述理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劳动的社会性承担了价值形式。因此，具体的劳动被转化为抽象的劳动，而其产品的价值形式则透过交换被转化为社会秩序的一种必要条件。一旦不同劳动产品的交换形式统一，交换就可以在不相等的具体劳动形式中创造出抽象的平等——根据像是平均社会劳动时间这样的标准，这让社会不平等得以自我再制。且由于其价值形式的特征影响人们的感知与行为，更达成拜物教的特性。

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法律被视为与价值形式一起启动的社会形式。它参与了不平等的具体劳动被抽象化的过程，借由施加相等的交换规则作为商品交换的先决条件（如：等价交换等价物）。以此为目标的法律文书是自由与平等的根本原则，亦为「法律主体」。事实上，虽然这些文书创建了可以自由交换等价商品的抽象的平等主体，但是却同时允许了私人利益与不平等的具体实行。以此而言，法制民主制度是一种让市场关系和交换被具体化和迷恋化的社会形势；也因此，他们使自己成为被迷恋的主体。

> 原始积累

对法律形式的批判创造出一个有解释力的变项，可以用来分析法律在资本积累的（再）稳定机制中的位置，而非分析积累重新复甦的过程及持续成

长的压力。正如关于原始积累的马克思相关讨论中所确立的，资本主义社会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社会。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的发展被视为，借由商品化非商品的空间而不断超越积累和成长极限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由无法在其原产地实现的总体剩馀价值以及过度积累的压力所引起的，这需要征收非商品化的区域以便完全的提取剩馀价值并分摊投资。

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奠基于借由重复的原始积累的不断剥削，伴随着「最下流的暴力」。这些行为应该被理解为直接暴力的形式（如：征服、抢劫和谋杀），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不是偶然，而是非常的频繁。作为一种理论的刺激，原始积累和征收的概念展现了法律在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只是作为拜物教的社会形式，事实上，它还扮演了另外的角色。但我们该如何形容它？这是种什么样的暴力？是否有某种法律安排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征收？

> 原始积累的合法暴力

有别于对法律形式的批评，对原始积累的讨论多着重在危机时期。根据David Harvey所说，在这些时期，资本的成长是由一股力量所驱动，这股力量借由允许（再）商品化来进行时空调整，使资本的流动不受限制。干预危机不仅需要重新建构空间与时间维

度，也需要创造对投资有益的环境。两者皆具有多种法律结构（如：软法、刑法、法律处分、警察暴力、战争……等）。它建立了一套复杂且动态的制度，既允许环境合理化（再）商品化，也允许用以剥削特定社会群体的暴力。

如同 Klaus Dörre 所主张，当今的经济—生态双重危机正借由原始积累的观点为当代诊断铺路。这此诊断中，经济—生态危机被解释为使成长、繁荣和民主间的关系不稳固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法律和社会秩序的参与可以借由考量积累的扩张压力来分析，而这股力量是由此危机所触发的。这个分析需要发展一个超越Habermas的标准范式的批判法律社会学。另一方面，原始积累的持续使用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与所谓的等价交换原则中的剥削模式相关，也与借由种族歧视、女性无偿劳动和过度剥削移工劳动力的次级剥削所带来的积累相关。当然，我们必须探问，是什么法律模式（社会立法、警察行动等）促使了这样的次级剥削。■

來信寄至：

Guilherme Leite Gonçalves
<guilherme.leite@uerj.br>

> 《全球对话》

波兰团队介绍



| *Jakub Barszczewski*



| *Aleksandra Biernacka*

| Iwona Bojadziejewa



| *Sara Herczyńska*



| *Justyna Kościńska*



| *Adam Müller*



| *Weronika Peek*



| *Jonathan Scovil*



| *Aleksandra Wagner*

Jakub Barszczewski 博士，现于 Białystok 大学教授社会学。研究兴趣包含批判理论、南方社会学、反殖民思想、反全球化霸权，以及创新性；博士论文则以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的反全球化霸权为主题。曾出版探讨后福特主义 (Post-Fordism) 中创新性论述的著作。

Aleksandra Biernacka 是社会研究研究所 (GSSR) 的博士候选人，就读于波兰科学院，社会学与哲学院文化理论系。现阶段的研究方向，主要为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电影翻拍、翻译理论、思想史、接收研究等。她拥有华沙大学的两个文学硕士学位——波兰语言学和美国文化研究。

Iwona Bojadziejewa 以社会学专业毕业于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目前正撰写一篇与环境相关的博士论文。她也在非政府组织工作，为改善波兰空气品质奔走。

Sara Herczyńska 为华沙大学波兰文化研究所的博士生，主要研究领域是记忆研究。她是大屠杀纪念研究小组成员，博士论文也以波兰传记博物馆为主题。她同时也是 *mała kultura współczesna* 杂志的编委会成员，以及扎切塔国家美术馆的导游。

Justyna Kościńska 是华沙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其研究领域包括都市社会学、社会参与、社会阶级和社会阶层；博士论文则是关于公共服务的空间可及性。自2019年起，担任全球对话波兰编辑委员会的协调员。

Adam Müller 是一位量化研究人员，现于美国国家资讯处理研究所担任助理。他拥有华沙大学社会学硕士和学士学位；目前研究兴趣是高等教育部门的变化模式，以及自然语言处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

Weronika Peek 是华沙大学英语研究硕士研究生，对社会学有着深厚的兴趣。研究旨趣包括认知语言学、概念隐喻、话语研究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Jonathan Scovil 为社会学博士生，就读于华沙大学与社会科学高等学院 (EHESS)，并参加由法国政府奖学金资助的跨校博士计划。研究兴趣包含宗教与知识社会学、社会人类学和思想史。博士研究以法国和波兰为例，探究欧洲对圣战恐怖主义的看法。

Aleksandra Wagner 在华沙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研究完成学士学位，并开始了硕士的求学生涯；研究兴趣是家庭社会学、养育与婚姻。